

第33卷第2/3期（總第221期）

2006.12.30

每冊港幣15元

從反對銷售稅到爭取最低工資制



台灣人民的反貪倒扁運動

平反冤假錯案，立即釋放程翔！

中共中央與地方諸侯的矛盾和抗衡

了解帝國主義的舊和新統治方式

關於拉丁美洲局勢的解說

歐洲左派號召群眾動員反對八國峰會

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

廣西托派史話

痛悼周冀甌、梁時傑、姜君羊同志

從反對銷售稅到爭取最低工資制

本刊評論員

香港特區政府在不久前推出一項新建議，要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簡稱銷售稅，GST），徵求港人意見。

官方解釋其開徵「理由」是：現時稅基太窄，需擴闊稅基，穩定稅源；港府今雖有 3 千多億元財政盈餘，但要預防會在經濟衰退時出現巨大赤字，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學螞蟻般積穀防寒冬飢餓等抽象話，以此威嚇港人。

但實際上，它所建議的銷售稅，規定各種商品和服務（如交通、看病等）都須加徵稅款，所有消費者不論貧富都無一例外，宣稱它符合「用者自付」這個不合理的偽稱「公平」的原則，使得低下階層市民的衣食住行等開支都要百上加斤，無理地增加他們的稅項負擔。

本來，許多大財團、大工商業資本家利用香港的優越有利條件，年年都賺得天文數字般的暴利，照理應該繳納累進的利得稅。但現時這個商人治港的香港政府，却一直拒絕實施累進利得稅制，使得愈是多賺錢的人和集團，不必交納愈高比率的稅，而這樣的累進利得稅，恰恰是能夠大大增加財政收入，穩定稅源的。

港府既然不肯增加富者這項負擔（他們對於交銷售稅當然毫不在乎，視為九牛一毛的小事），却要從低下階層市民身上大打主意，實等於劫貧濟富，加劇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兩極懸殊差距（香港現時的貧富懸殊已在東南亞列第一位，全球則排第五）。

而且，這項銷售稅不但對低下階層市民影響最大，損害最多，即對於中小商人和中產人士也認為是害多利少的。據許多民調顯示，反對銷售稅的市民總是佔了大多數，不少更達 7、8 成以上；全港各方面反對之聲四起，此起彼落，遊行抗議接二連三，反應之惡劣而且普遍強烈，十分罕見。

當局之劫貧濟富，還表現在堅決拒絕民間不斷提出的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要求，讓資本家盡量剝削工人，只給予可耻的工資待遇，比如最近揭露的事例就有：政府資助機構盲人輔導會的健全工只得月薪 2000 元，平均時薪約 8 元多；年年賺得巨額利

潤的九巴，其外判清潔工也只得 8.30 元；（迪士尼樂園的大陸 3 間精品工廠，更有工人日做 14 小時，時薪只得 1.7 元）。港府實則是在助紂為虐。特首在公開講話時常常稱「普羅大眾」而不稱市民大眾，表現他好像很愛護基層勞苦大眾似的，但在政策措施上却反其道而行。

香港政府的施政實際上是在擴大貧富懸殊的差距，以致香港的低收入家庭月入低於國際所訂定的貧窮線。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05 年 7 至 8 月訪問了 101 個低收入家庭的結果顯示，這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每月 6500 元，人均收入的中位數只有 1750 元，較國際所訂的貧窮線 2438 元低 2.8 成，其中更有家庭每月需交 3700 元的公屋租金（05 年 10 月 17 日《蘋果日報》）。

同一調查也顯示，現時香港約有 119 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佔全港人口約 6 分之 1（06 年 1 月 6 日《明報》）。如果實施銷售稅，這類家庭和其他困難家庭也一律要負擔額外開支——儘管財政司說會考慮給予些補助。

由於建議遭到如此普遍而強烈的反對，形成巨大的壓力，迫使各政黨至今為止，幾乎都表態反對。

為要阻止這項損害絕大多數市民利益的建議實施，廣大市民及其社團都必須繼續努力，加以阻止；同時，對於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立法，則繼續爭取其實現！

2006 年 9 月 24 日

後記：在港人和各政黨非常強烈的反對下，財政司長唐英年，僅在特首選委會選舉之前 4 天，便突然改變過去的強硬態度，宣佈停止推介銷售稅，替曾特首的「競選」連任拆除「炸彈」（繼西九「推倒重來」和最近發生的學券制、食物安全等「政治炸彈」之後）。這些都表現出特首帶領下的有關高層官員的錯失及低能。

2006 年 12 月 6 日

台灣人民的反貪倒扁運動

軍行

陳水扁在 6 年前競選總統時，曾信誓旦旦地宣佈以深化民主，肅清黑金為政綱。但施政以來，百物騰貴，民生疾苦加深，台灣家庭平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近年更創歷史的新高，使社會矛盾加劇；「第一家庭」的貪污醜聞被揭發，顯然與他的競選承諾大相違反，因而更加激起民怨沸騰，促使廣大台灣民眾上街遊行、集會、靜坐抗議，提出「打倒貪腐」、「阿扁下台」的訴求。

數十萬以至百多萬民眾多次的行動，部份人更持續一個多月的上街靜坐，充分表現出這次群眾運動的聲勢浩大、堅定不移地反對貪腐的決心。他們運用過去所爭得來的民主自由權利，發揮力量，從遊行示威、靜坐、發表政見，發展到要求罷免台灣最高領導人，都表現出台灣社會所存有的民主自由的可貴。

在群眾運動洶湧澎湃的氣氛和壓力下，台灣高檢的檢察官陳瑞仁終於起訴第一夫人吳淑珍，控告她偽造文書貪污了公款 1480 萬新台幣；阿扁因享有總統轄免權，卸任後才面對檢控。這顯示出台灣走向某種程度的司法獨立制度的另一可貴優點。針對檢察官的控告，陳水扁公開發表電視講話，為自己辯解，指檢察官對他不公平，對某些事不了解，他想施緩兵之計，承諾在其妻一審判決有罪，他便立即下台。不過，如果一審判決拖延到將近一年以後，則距離他的任期屆滿也不遠了。

儘管台灣存有的上述兩方面優點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表現，卻比大陸優勝得多，雖然後者的統治層自誇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實則是冒用「社會主義」這個名義）。大陸的無數官僚無論權位大小，都會像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代那樣的「貪污瀆職」，許多人貪污的金額，遠比吳淑珍所涉嫌貪污的金額（折合人民幣將近 350 萬元）多得驚人，但卻逍遙法外，中共上層若不以之示眾而揭發，則中國人民也很少敢於自動地首先控告貪腐幹部。這次台灣廣大人民勇敢地持續很久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矛頭直指台灣總

統及其家人，這是八九民運被鎮壓以後內地所望塵莫及的；而內地的司法制度，也完全受當權黨領導人的控制、指揮，並無獨立性可言。

大陸當局對台灣人民反對民進黨而打擊後者的聲勢，削弱其政治影響力，自然會有「漁翁得利」的喜悅。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另一方面，當大陸人民從各種媒體中看到、聽到台灣同胞的反貪腐、倒總統運動那樣的自由發展、不受限制，而司法制度又那樣的走向獨立，不受當局巨大影響，他們就會從兩岸實況比較中得到很大啟發，因而要努力急起直追，以台灣同胞為榜樣。這是內地統治者所深感憂慮，而要盡力防備的。

因此，領導人對台灣群眾運動取態低調，不加批評，傳媒報道也隨之低調。但科技資訊發達，內地同胞仍可經由媒體得知實情，引發他們的正面反應。因此，這次台灣的群眾運動對兩岸都有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陳水扁靠着還有民進黨高層和部份（但在日趨減少）群眾的支持，至本文執筆時仍在負隅頑抗，不肯立即辭職。但不管他戀棧到幾時，下台只是遲早問題。

當然，阿扁下台，並不意味台灣所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重大問題就能因而基本上解決；只有群眾運動高度發展到民眾掌握了權力，成立了民眾的民主政權，取代了現時的立法院兩大黨操控、只顧爭權奪利的局面，才可能開始解決台灣的根本問題。而在目前，我們贊同台灣工人民主協會所提的三項主張，即：

- 一、人民有權直接罷免總統，降低罷免門檻；
- 二、限制金權干政，禁止公司捐贈政治獻金；
- 三、民生優先，改正一切劫貧濟富的政策。

2006 年 11 月 8 日

[編者註：該文詳見本刊本期轉載的全文]

「人民掌權，打倒貪腐，革新政治」

——工人民主協會對於倒扁運動的看法(轉載)

高捷案、台開案、國票金董座案、SOGO 禮券案……，陳水扁總統的家人與親信深陷重重弊案，最近的國務機要費案更直接涉及總統本人。扁政權不但是以貪腐集團為其核心，更重要的是執政六年以來，非但未能實現當初許諾的「民主深化」、「肅清黑金」，反而一方面在兩岸關係上屢屢違背承諾，刻意升高兩岸間的緊張對立，另一方面厲行一連串劫貧濟富、「化公為私」的社會經濟政策：BOT、私有化、金融合併、給予財團減稅和補貼的優惠、教育與醫療費用飛漲等等。陳水扁繼續在位只代表台灣政治的繼續腐化、社會矛盾繼續加深。

如今「道德勸說」、司法調查和國會監督制衡都無法讓陳水扁知所進退，只有人民形成強大的群眾運動，才有辦法迫使以陳水扁為代表的貪腐集團下台，並徹查所有弊案。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不但支持並響應目前一些政治團體與人物號召的「以人民力量來倒扁」，更要堅定的把這場群眾運動推動下去，不容任何政黨、個人妥協、背叛或是謀取私利。

許多綠營的政治人物辯稱，陳水扁下台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同意陳水扁下台無法完全解決金權政治等問題，但是我們不是以此為藉口來替貪腐集團脫罪，而是除了要求貪腐集團立即下台並查辦外，更不把任何希望寄託在舊體制裡的政黨政客，也完全不幻想呂秀蓮代替陳水扁或者國民黨取代民進黨就能解決廣大人民的深刻不滿。至於各種政黨重組、政客結盟的傳聞，這根本是幾個和舊體制勾連甚深的大政客為謀權位的無原則結合，豈值得人民信賴？

我們的目標是要把運動進行到底，積極促進民眾自己來推動各種重大的政治社會改革。所以我們不但重視要讓貪腐集團立即下台，也重視政治社會改革的方向。如今個別準備發動倒扁運動的政治人物表示要推動內閣制，我們認為相對於現今的政制，行政機關直接向國會負責的內閣制

或許有相對的進步性，但根本無助於解決金權政治，例如採行內閣制的日本，正是金權政治十分嚴重的國家。

相對於內閣制，我們認為以下的改革，是更為迫切而有針對性、民主與民生並重，值得我們積極推動：

一、人民有權直接罷免總統，降低民選官員罷免門檻。

但現在總統罷免案必須經由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數委員同意才能交付公民複決，不但是過高的門檻，而且使人民根本無法直接行使罷免權。從此次總統罷免案就知道這樣的罷免權並無多大實際意義。因此我們要求讓人民可以直接啟動罷免總統的過程，無須經由立法院。同時降低各級公職人員的罷免門檻，隨時撤換不適任官員。徹底改造當前阻礙民意的體制，大幅降低人民罷免權的門檻，讓人民公意能及時表現。

二、限制金權干政，禁止公司捐贈政治獻金。

財團富豪收買官員政客取得不當利益的方法，除了直接行賄之外，還有捐贈政治獻金。這是典型的「官商勾結、財團得利」，財團汲取勞動大眾創造的財富，獻出油水換取統治者的體貼保護，同時也格外助長了大資本家的政治影響力。因此我們要求修改政治獻金法，完全禁止公司及其代表人捐贈政治獻金。

三、民生優先，改正一切劫貧濟富的政策。

過去幾年物價、油價、學費不斷飆漲，同時勞動條件惡化、社會福利縮減，一般人民生活越來越艱苦。反觀幾個大財團，卻能在政府的政策偏袒、稅負減免和各項補助下日益茁壯，資產倍增。政府獨厚財團，對市井小民極不友善，不啻劫貧濟富。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與平等的社會，要求政府施政以民生為優先，改正一切劫貧濟富的不公政策。

最後，我們要強調的是：台灣已經實現了所謂的民主，然而現行這種代議民主制只讓人民每

隔幾年投票一次選舉統治者（亦即壓迫者），而不讓人民真正掌握政治大權；而資本主義（就是讓市場、也就是富豪財團主宰經濟的制度）今日已成爲純粹保障少數資本家日益殘酷剝削絕大多數人民的制度，而不能爲人民謀福利。所以，即使把陳水扁或民進黨拉下台，換一個同樣擁護資本主義的政黨或政客執政，依舊不會改變勞苦大眾生活日益惡化的命運。因此，勞動人民毋須寄望

任何擁護資本主義的政黨或政客。我們認爲，勞動人民的出路在於徹底擺脫金權統治，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建立真正代表勞動人民的政府，而目前則要從打造真正屬於勞動人民的政黨做起。要把反貪腐及政治革新運動與建立勞動人民自己的政黨和爭取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奮鬥結合起來！

新聞自由萬歲 秘密審判可恥 立即釋放程翔

（轉載）

《海峽時報》駐華記者程翔於去年 4 月 22 日，被中國「國安」人員拘捕以來，一直都被指爲「間諜」，至今已近 16 個月，現盛傳將會在明天於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審，但卻拒絕其家屬旁聽，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秘密審判。今年初，法院就曾指證據不足，駁回檢察院之檢控，足證程翔遭當局違法長期拘留，仍然苦無罪證將之判刑之一斑，所謂間諜之罪，亦不過是暗無天日之構陷，與秦檜當年之「莫須有」一樣，荒謬恐怖！

其實，中共政府對新聞記者之打壓，可說由來已久，以「間諜」及洩露國家機密罪，誣告異見者，亦屢見不少。例如 1979 年，就曾將民刊主辦人魏京生秘密審訊，並判刑十五年；但其審判

紀錄其後公諸於世，卻暴露所謂罪狀，不過是捕風捉影之羅織，遭舉世所恥笑。又如去年 4 月 30 日，當局又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將湖南記者師濤重判入獄 10 年，過程亦如出一轍，毫無理據，於法庭內無公開旁聽下，匆匆將之宣判！根據「保護記者協會」之統計，中國也一直是拘禁傳媒工作者之最。因此，我們在此聲援程翔先生，並重申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不容剝奪，譴責中共以言入罪，用秘密審判壓逼異己，更強烈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程翔、師濤及所有在囚記者！

四五行動
社會民主連線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

平反冤假錯案，立即釋放程翔！

振言



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被他所深愛的祖國當局扣上「洩露國家機密」的莫須有罪名，在遭受違反規定長期拘禁期間，又不許他與家人和律師會面，反而由外交部和新華社急急發佈消息，指他確實觸犯間諜罪，收了數百萬元的情報費，從而造成未審先判的「事實」。嗣後，法院肯定他供給台灣的情報機關《中華歐亞基金會》以國家機密資料，重判五年徒刑；但檢控部門和法院始終沒有提出證據證明《中華歐亞基金會》是間諜組織，而內地一向也有不少機構和學者（包括前基本法草委許崇德教授）都曾與該基金會交流活動，向它提供資料。

在一審開庭時，是閉門審判，審理過程草草了事，定罪證據不足。據報道，程翔在庭上作簡單辯護，聲稱「自己無罪，從未做過危害國家的事情，堅信自己的行為，有利於兩岸三地的穩定。」但完全不獲法庭考慮和接納。

程翔思想進步，熱愛國家，於74年入香港《文匯報》當記者，後擔任該報駐京記者，又獲升為主筆及副總編輯。在89年6.4鎮壓期間，該報發表只有「痛心疾首」四字的空白社論，同情民運，社長李子誦與程翔等人辭職，創辦《當代》雜誌。

他自認對中國的情意結太深重。知道他為人的，可說都不相信他會為錢而甘當間諜，出賣國家的。因而案件在香港以至海外，都引起很大迴響，同情程翔之聲四起。

在程翔及其家人完全不服法院判決，向北京高級法院提出上訴之後，北京高院又決定不會開庭再聽取被告辯方的陳詞及理據，只作書面判決。這即是表示，程翔及其代表律師連再次辯護反駁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從程翔被當局違法地長期拘禁、閉門秘密審訊、判決所公佈的理據含糊不足仍被重判五年徒刑，直到高院不開庭聽取被告再作申訴辯駁，致使被告根據憲法等規定所應享有的民主人權等權利，都被當局任意剝奪掉，人民的言論自由、發表自由都不能享有……。這一切表現都再次證明當局宣稱的「依法治國」只是美麗的假大空話，官僚繼續破壞着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則。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無數的冤假錯案不知有多少人無辜遭到苦難、折磨、甚至枉死。不但是平民百姓，而且有不少黨員幹部和領導人都難倖免。後來提出了要糾正冤假錯案，制定法律，以「依法」辦事。但實際上大量的冤假錯案仍在全國不斷發生，人民繼續受害，包括許多不同意見人士，甚至是幫助窮人的維權律師。現時的程翔案件，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宗。這些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在於人民無權而當局專權的政治制度，因此，才會不斷產生。要防止再有這種案件發生，有效的辦法是徹底廢除這種政治制度！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與地方諸侯的矛盾和抗衡

張開

經濟發展過熱

中共自從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後，以前實行的計劃經濟（儘管是官僚式的）和外資壟斷權也日益名不存實漸亡了（連一向慣用的「五年計劃」也改稱為「五年規劃」），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避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所指揮，在現時就表現為經濟發展過熱。中央從全局著想，要經濟降溫，減低發展速度；但地方政府則以本身或所管地方的利益為重。這就造成中共中央幾年來推出要遏止經濟過熱的宏調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抗拒，從而反映出其統治危機在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06年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較上年同期相比增長31.3%。這顯示出過高增長趨勢仍難以遏制。

就在這種經濟過熱的時候，國統局局長邱曉華卻在6月12日對北京大學師生發表演說，似乎洋洋得意地宣稱：在「十一五」（2006至2010年）的末期，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趕上全球第3位的德國，和美國、日本等經濟強國三足鼎立，並可望在15年趕上日本，在2049左右趕上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系的美國⁽¹⁾。這使人回憶起毛澤東在50年代的7年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大躍進宣佈，也與中央現時的調控決策精神相違反。

地方諸侯火上加油

胡錦濤最近再次提出，今年下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切實控制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儘管這樣的「重要講話」，幾年來已重申過多次，但無數

地方官員仍然置若罔聞，我行我素。難怪報章傳媒用「諸侯」來稱呼後者，形容他們有如封建時代的地方諸侯各據山頭，近乎半獨立的表現。

儘管中央在2003年已訂出，地方政府必須採取的措施是，要調控土地開發以及銀行貸款總額，溫家寶在今年3月的政府報告中，再次提出要降低經濟發展過熱、收緊信貸，預測GDP增長為8%，而4間國有商業銀行已遵令減少信貸，6月份的新增貸款為600億元人民幣（下同），但其他非國有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卻新增貸款3000億元，陷於「失控」狀態，經濟繼續升溫，GDP在上半年仍高達10.9%，第二季度更高達11.3%，為12年來的新高。⁽²⁾

中央在最近仍經過發改委文章警告，內地必須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否則會加大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增大金融風險，引發通貨膨脹，令到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增加銀行壞帳。因此當前宏調的重點就是控制投資過快增長。⁽³⁾

但地方幹部卻熱衷於自己的「政績工程」，幫助地產商大量投資囤地，炒買炒賣樓宇。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蕭元真新近撰寫的報告指出：內地房地產商大肆囤積土地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土地成本與開發收益相比實在微不足道。房地產商之所以敢於和能夠大量囤積土地的原因主要不外乎三點：一是內地部份地方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其二是政府部門中少數手中握有土地審批大權的人以權謀私；其三是銀行信貸的管理不善，使得房地產開發商很容易地就可以將短缺的

資金通過貸款來換得大量的土地儲備。

據統計，中國內地相當一部分的房地產開發商在當前的宏調過程中，仍在繼續大量囤積土地。而在一年前開始實施的房地產宏調措施中，就已將囤積土地和炒買炒賣等投機行為，作為重點打擊和整治的對象。

這些事實表明：許多地方官員（更不必說地產商了）根本就不理中央一年前頒行的房地產宏調措施，在實際上是背道而行。

國家審計署的審查報告，也暴露出各地諸侯損公肥私的另一些事實：

在 2003 年至 2005 年間，部份地方政府竟然挑戰國務院嚴禁低價出讓土地的政策，採取手段，變相低價出讓土地，導致國家少收 55.65 億元。在審計的 87 個開發區中，有 79 個開發區向企業返還稅款 120.15 億元。這一做法無疑加劇了地區間「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同時，各地開發區擅自擴大開發區面積和稅收優惠政策，亦導致國家損失 66.47 億元的稅款。報告顯示，去年在對全國高等級公路建設項目的審計中發現，有 21 個項目應付給農民徵地補償費的遭當地政府及徵地拆遷部門截留挪用、拖欠和扣減，欠費共計人民幣 16.39 億元。

(4)

另一方面，外資近幾年來大量投入內地的房地產，助長了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單在 05 年，來自美、澳洲、新加坡的外資有 110 億美元投資房地產，炒買炒賣，而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則估計會從 05 年的 791 億美元增加至 06 年的 865 億美元。這是中央吸取外商大量投資的惡果之一的呈現。

中央針對這種炒樓活動，推出了溫和的限制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措施，但大部份地產商都表示，這些政策措施不會影響他們的業務，雖有影響，也屬短暫，而長遠則有利於大地產商。(5)

國務院 5 月推出整頓樓市的「國六條」後，

廣州在 8 月底截止招標的一幅 155 萬平方呎市郊土地，卻依然引來地產商「瘋狂」出價，最高標價更達 17.5 億元，即落成後樓價會達每平方呎 900 元，比該區現時樓價高出近倍。(6) 反映出地產商對於中央的宏調政策並不懼怕。

中央宏調變成「空調」

為要從源頭上收緊土地供應，遏制炒樓活動，中央近期頻密推出調控措施。但違法用地屢禁不止，收緊供地任務艱巨，各地諸侯陽奉陰違，一些地方囤地花樣翻新，「以租代徵」，避開了建設用地審查報批；「金蟬脫殼」，偷逃了巨額土地轉讓稅費。

面對著各種的對抗，國務院於是加強更多更強的調控措施：發改委主任馬凱日前表示，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仍很突出，經濟增長偏快，發展代價過大。下半年，將堅決抑制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的加劇之勢，繼續嚴把土地、信貸和市場准入的「門檻」，完善外資外貿政策，積極擴大消費需求。要逐項落實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各項政策措施，在項目核准、住房建設計劃等方面把好關，抓好土地和住房供應結構調整，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建規模和進度。按照國務院統一部署，將組織由部門領導帶隊的檢查組，對各地落實情況進行檢查。

與此同時，建設部、發改委和工商管理總局聯合開展整頓規範房地產的行動。雖然中央連續地加大調控措施，但各地樓價並無普遍下降，「因部分地方政府執行力度未緊貼中央政策而未能成功壓抑樓價，且更有上升的趨勢，當中以深圳一手住宅成交價格上升 30% 最為顯著。」(7)

即使有報稱樓價已下跌的上海市，但據報道，這是假的下跌，實即是代理與買賣三方協議少報成交樓價，各方得利；又可令官方據以宣稱宏調已經見效。9 月 30 日《蘋果日報》的華辛文章便以上海浦東的售樓情況為例，報

道了上述的真相。

由於 GDP 增加可以拉動就業、增加稅收、抬高地價，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密切關係，因而無視中央宏調禁令，熱衷於把 GDP 增長作為政績標榜。

信貸規模過大的原因也是這樣。雖然中央採取了緊縮型貨幣政策，但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化解。近年來，為了獲取銀行貸款，帶動 GDP 增長，地方政府往往通過與銀行簽定所謂「銀政合作協議」的方式，變相為地方投資項目提供貸款擔保。

中央的宏調命令遭到各地方政府的抗拒，變成常見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宏調」變成了「空調」，既激化了中共內部的矛盾衝突，又揭示出中共統治危機的惡化。

撤陳良宇職示眾

為要有力地打擊「不聽話」的各地諸侯，中共中央決意利用第 17 次黨代表大會召開前地方黨委換屆的機會，把鄉、縣、地市到省級的黨委整飭、篩選，希圖減少抗拒阻力，增加各地黨委對中央的支持。

不過，對於有實力、難靠換屆重選加以撤職而又不願執行中央調控政策，甚至對著幹的地方領導幹部，那就要訴諸組織行政的手段，用某種罪名予以撤職了。陳良宇被免去上海市委書記一職，以及停止其政治局委員職，並且由中紀委立案調查其嚴重違紀問題，就是顯例。據初步公佈的「理由」是：他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法企業主謀取利益，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

但在這種反腐的理由背後，實際存有其他的深層次原因。陳良宇據說是江澤民「上海幫」的旗手，與中央的大力壓縮經濟過熱的宏調等政策存在利益上的衝突和異議，是地方諸侯中的強硬囂張人物，據報道，他曾在一次政治局

會議上，向總理溫家寶發難，爭論很久，指摘中央政策將錯過發展良機。

向陳良宇動手，是對其餘不聽話的地方諸侯嚴重示警，跟著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整肅。不過，整肅一批諸侯，並不能有效地消除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衝突。內地一些學者認為，此番經濟過熱具有結構性、體制性等深層方面的原因，與多年來形成的幹部任用、考核、提拔機制有直接關係。地方政府對宏調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獲得經濟增長利益的現象將持續存在，且有可能越演越烈。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日前刊登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的文章指出，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根源是政府體制改革不徹底，內地「分灶吃飯」的財政制度造成地方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根本的改革在於徹底結束地方政府獨立的經濟利益，把地方政府從目前的「準企業」狀態還原為「真政府」。

事實是，政府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徹底，在於政府並非真正由全體人民民主地選舉產生，而要做到民主地選出，則必須廢除一黨專政，改變壟斷的專制體制，廢除各級幹部擁有的政經特權，讓人民和政治團體、所有黨派都享有言論、出版、發表政見、爭取人民支持、參加各級政府組成的選舉和被選，這樣產生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才可能徹底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2006 年 9 月 30 日

註釋：

- (1) 6 月 14 日《香港經濟日報》。
- (2) 7 月 12 日《香港經濟日報》。
- (3) 8 月 3 日《蘋果日報》。
- (4) 6 月 28 日《蘋果日報》載中新社電。
- (5) 7 月 25 日《文匯報》。
- (6) 9 月 2 日《香港經濟日報》。
- (7) 9 月 26 日《文匯報》。

痛悼周冀甌(兆立)同志〈1929—2006〉

十月評論社同仁



周冀甌同志長期以筆名兆立爲本刊從事翻譯工作，2006年8月15日在加拿大多倫多市非常不幸地逝世，我們很感痛惜。

周同志在1929年12月23日出生於中國溫州，成長於中國巨大動盪變革時代，因而培育出進步的政治理念。其父是國民黨軍官，在日本侵華時期及其後的內戰時期，經常與家人分散，周同志多由溫州的祖父母照顧，其母及弟妹則跟隨其父在外。在中學時期，他受到40年代初中國民主運動深深的感召，在左派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他在分析中國革命在20年代後期對抗北方軍閥的失敗原因時，接觸到托洛茨基的思想，此後終生便奉行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張。

1949年，其母恐其政治立場會影響他的安危，敦促他離開中國大陸。他在除了一身衣服便別無所有的情形下，乘坐中共解放溫州前最後一班船抵達台灣。父母和兩弟一妹則留在大陸，父親在內戰將結束前被擒，在獄中去世，母親從未離開大陸，在1992年12月25日與世長辭。

在台灣，周同志報讀台灣師範大學，因爲學費全免。畢業後，獲美國一所研究院取錄入讀研究生，可惜無法符合簽證所要求的經濟條件，於是留在台灣3年，頭兩年在後備軍營服役，另一年任職教中學。1956年，周同志獲加拿大的英國哥倫比亞大學(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UBC))錄取攻讀研究生學位，並成功取得簽證。1956年秋向朋友借貸籌得機票款，抵達加拿大。完成UBC的數學碩士學位後，在加拿大聯邦政府任職統計分析。同一時候，他認識黃芬我女士，1961年結婚。1964年，開始在一間保險公司任職，接受培訓成爲保險公司的精算師。1986年因眼疾失去大部份視力而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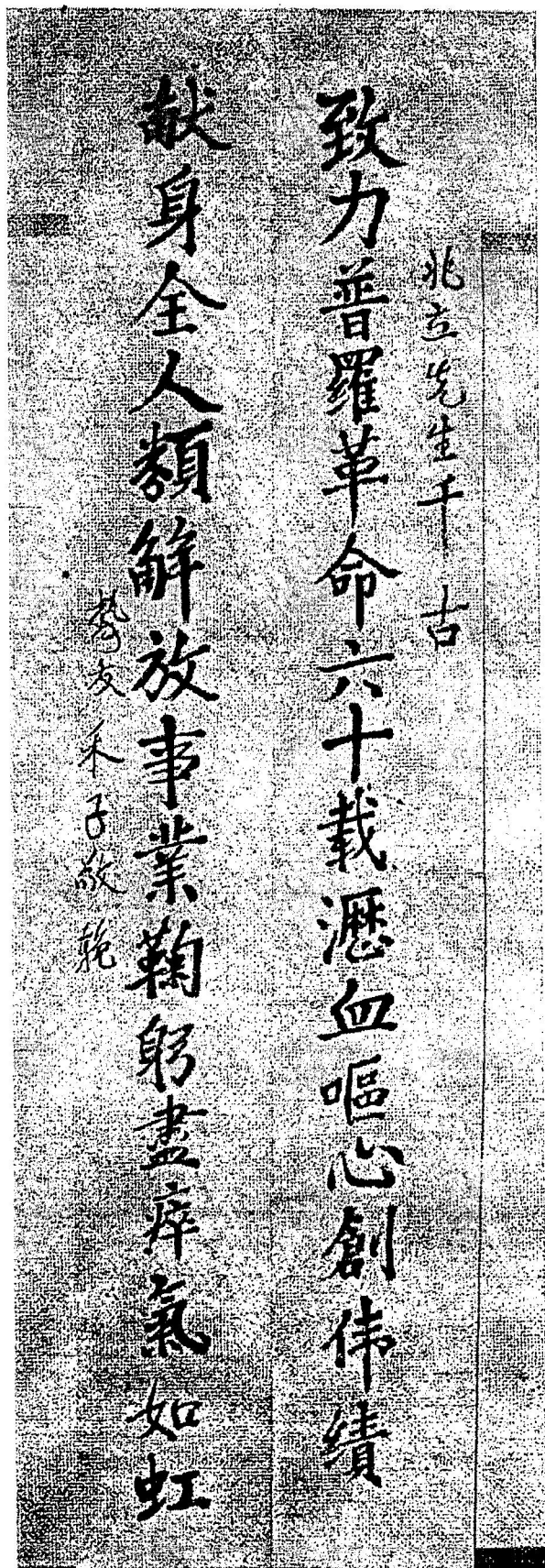
嗣後20年，終其一生奉獻給進步政治工作。他使用一部機器，把字母一個一個放大在電視螢幕上，每天長時間伏案從事於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直到腦癌侵害其大腦、被迫臥床時，他才擱筆。他從不動搖，樂觀地深信人類終會達到一個人人平等的合理社會。冀甌同志遺下妻子黃芬我女士、女兒周微微醫生〈多倫多大學醫科畢業〉、兒子周加生博士〈麻省理工大學畢業，現於華盛頓從事科研〉、以及剛剛出生的孫女周心月。

冀甌同志雖然因眼疾而辭職退休了，但實際上是退而不休，反而使他用全部時間去貫徹他的理想，專心致志於翻譯第四國際的重要文件和領導人著作。由於他的中、英文水準高，理解力強，邊看邊譯，文字淺白流暢，很能表達出原文及作者的本意。其重要且已公開發表的譯文有：第四國際在20多年內召開的各次世界大會文件，曼德爾著的《以托洛茨基作爲可供選擇的道路》，沙瑪莉著的《計劃、市場與民主》和《曼德爾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以及大量的當前政治和理論問題的譯文。他的這些譯文，大部分都收集在十月書屋1997年5月出版的8卷《社會主義研究叢書》內，其中的《第四國際文獻》譯文，更佔了3卷《文獻》中的大部分。他認爲，把這些重要文件、文章譯成中文，將有助於溝通中文讀者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瞭解，增加對現實政治發展及立場等的認識。他是完全自動自覺地作出這種努力，盡一己之力貢獻給革命運動的！

我們相信，冀甌同志一生爲促進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的史實及其翻譯成果，將永遠活在人民的記憶中！
2006年8月18日

悼念兆立同志〈1929—2006〉

禾子



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傳來令人極為悲痛的消息：兆立同志於八月十五日晚十一時五十五分因患腦瘤醫治無效與世長辭。這是我們不可挽回的沉重損失。兆立同志奮鬥的一生，是很值得紀念的。

兆立同志姓周、名冀甌，生於 1929 年 12 月 23 日，小學和初中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轟炸和三度佔領的戰亂中度過的。溫州模範小學校長王曉梅和黃禹石等進步教師的抗日救亡思想教育，使他幼小的心靈深深埋下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種子。他不僅積攢零用錢捐獻，還和同學一起冒著風雨，走街穿巷，義賣手工課的製品，為抗日戰士募捐。他在溫州中學讀高中時，正值全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自 1946 年抗議美軍在北京的暴行的沈崇事件，接著“一二一”昆明血案，繼而南京、上海、天津鎮壓學生的“五二〇”事件，溫州中學學生都熱烈響應抗議。兆立更是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中去。尤其是 1947 年“六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他和班級同學不分晝夜寫制標語、傳單和街頭漫畫海報，編寫反對內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一切不民主制度的歌曲。兆立從小就喜愛音樂，拉得一手好二胡。他領頭組織《在一起》歌詠隊，在同學中教唱進步歌曲。一些喜聞樂唱的，如“團結就是力量”、“跌倒算什麼？”、“山那邊呀好地方”等等嚮往民主的歌曲，一時間，從這個歌詠隊傳遍班級和鄰班。為了配合運動，他們還把大家熟悉的嚮往光明的歌曲，例如“誰願意做奴隸”的歌詞改為“誰願意打內戰”。不僅團結了全班同學，活躍了戰鬥氣氛，而且在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的隊伍中、不僅口號聲此起彼伏，由《在一起》歌詠隊教唱的革命歌聲響徹溫州市大街小巷。

學生運動鍛煉了兆立同志的意志，提高了思想覺悟。在進步同學的介紹下，他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尋覓國家和民族

的前途，閱讀《青年與婦女》、《新旗》、《求真》等刊物和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等著作，認識到 1925—1927 年中國大革命是斯大林的愚蠢和錯誤導致失敗的，從而選擇了托洛茨基所指引的不斷革命論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道路。

1949 年他考入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後於 1956 年赴加拿大、考入 U·B·C·(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數學碩士，獲得學位後在多倫多長期從事計算工作。他始終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放在首位，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1961 年他和黃芬我女士結婚。黃女士一直支持他的革命事業。他為人熱情、正直、剛毅、助人為樂。他們生活儉樸，節省費用，資助工人運動和困難的同志。到加拿大幾十年，以至兩個孩子都長大時，他們仍住在公寓房子裏。由於長期在電腦螢幕前工作，加上病菌入侵眼睛，他的雙眼的視網膜受損，視力大大下降。醫生告誡他盡量勿面對電子螢幕。但他關心革命事業甚於生命，革命的需要使他置自己的健康而不顧，設法通過螢幕放大，近距離地、極其艱難地、長期堅持翻譯大量革命理論著作和文章，有些已收編成書，並將這些書贈送給諸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就曾頒送贈書榮譽証給出版這些書的「十月書屋」。他還長期為《十月評論》翻譯有關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曼德爾的著作和第四國際重要文件，如《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以托洛茨基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以及《曼德爾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等等大量文章和著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他關心世界大事，不顧視力低下，堅持每天在放大螢幕前困難地閱讀大量報刊雜誌和電視新聞，並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在 2003 年 1 月 22 日給我信中寫道：“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你問我作為美國鄰國的加拿大對這場戰爭持什麼態度？加拿大人百分之八十是反對這場戰爭的。事實上，全世界人民都在反對這場戰爭。剛過去周末是全世界反戰日，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中東、日本、澳洲……等國人民都在反對美國發動這場戰爭。昨天，美國參議員、已故的肯尼迪總統

的弟弟特迪·肯尼迪說：‘這是在錯誤的時候所發動的錯誤戰爭’（Wrong war at a wrong time）。美國人民在遊行時所舉的標語是：‘不要以血換石油’（No blood for oil）。可見人人都知道這是美國大資本家的代表為了攫取伊拉克石油發動的戰爭”。時隔三個月，2003 年 4 月 21 日的來信中寫道：“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雖接近尾聲，但是它的麻煩才剛剛開始。伊拉克人民大規模上街示威遊行，反對薩達姆，也反對美軍的佔領。世界上反戰人士開始向國際法庭對美國提出公訴，它犯了戰爭罪。所以，美國布什政府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三年多來布什政府在伊戰泥潭中越陷越深的事實，証實兆立同志當時的預言多麼正確！在當今世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雖然仍很強大，而矛盾重重，且正走向沒落。具有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眼光的兆立同志對歷史的發展，用他 2005 年 12 月 5 日來信中的話說：“我對整個局勢充滿樂觀！”

自 1946 年投身革命運動至 2006 年離開我們，兆立同志始終堅持不斷革命論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觀點，熱情洋溢地致力群眾革命運動，默默地專注筆耕革命理論建設，不顧個人安危，滿懷信心，六十年如一日，將自己的整個生命和精力貢獻給人類解放事業。我們會永遠銘記他奮鬥一生的功績、高尚的品德和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他所走的路，後繼有人！



痛悼梁時傑同志〈1922—2006〉

十月評論社同仁



梁時傑同志原名梁庭詠，又名定榮，十分不幸於本月 20 月病逝，同仁等很感難過。

時傑同志在 1922 年出生於廣西蒲北縣寨墟鎮。在他 17 歲唸中學時，信仰了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結合其餘的托派份子，參加抗戰救亡工作，到各處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1939 年參加國民黨廣西當局組織的學生軍，並排演戲劇，號召民眾起來抗日。

但在此時，廣西的中共人員執行王明、康生等中央領導人所捏造的「托匪漢奸」罪名進行反托的命令，對廣西省內有托派思想或其同情者，大肆污蔑攻擊，並利用當局力量拘捕了其中 13 人加以審訊逼供，但毫無所得後仍然無理地關押了半年才予釋放。

40 年代初，時傑被迫離開廣西，到廣東韶關，入讀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簡稱「藝專」〉，攻讀戲劇、選科舞蹈，歷時 3 年，畢業後即參與劇團編排戲劇演出，在演藝界漸有名聲，並且在廣東省肇慶中學執教。

他在 1947 年轉來香港，參加同志們組成的克克劇社，負責編排導演獨幕劇、指導舞蹈等工作，大家稱他為『文化人』。

當時在港英殖民地政府反動統治下，對港人盡量在經濟上榨取，成果交回『老家』，更在政治上加緊壓迫，發現有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幾乎都被遞解出境，而對一般社團，也加以箝制，曾一次過取締了 36 個團體，克克劇社也在其內〈另一個她的姊妹劇團『綠洲劇社』也同被取締〉。這不但影響了他的演出工作，而且被迫離港，再到韶關教書。1949 年大陸解放後，他又不能見容於中共政權，必須再次來港，在中學任教，並與社會上的文化界和學生團體交往，幫助排演等工作。他為人和藹可親，熱心助人，喜歡接近年青人，互相打成一片，部份可能由於他身材較為健碩，被暱稱為『大木』。

對於本刊的出版，他也盡過很大力量，為本刊撰寫有關中國和香港問題文章，所用筆名為『大流沙』，也有時用『山前雨』、『江上飛』等名，文字流暢，且富文藝筆調。

進入老年，自學校退休後，時傑為多種疾病纏身，尤其是雙腳腫爛，不良於行，健康日壞，與病痛搏鬥多年，終於『潰敗』下來，終年 84 歲。回顧他的一生，自從信奉了托洛茨基主義後，60 多年來，多次遭受不同統治者的政治壓迫，但並未表示過動搖、放棄其信仰，這種堅持精神是很難能可貴的。

2006 年 8 月 23 日

痛悼姜君羊同志〈1922—2006〉

十月評論社同人



姜君羊同志，我們的蔚然老戰友，非常不幸地在本月 22 日病逝，終年 85 歲，同人等深感難過痛惜。

君羊同志在 1922 年 3 月 28 日出生於廣西省南寧市。他 16 歲在南寧唸中學時，接受了當時在當地散播的托洛茨基主義（南寧和桂林是中國托派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

1945 年君羊與他的一班同志在《南寧商報》編輯部工作，他擔任為記者。46 年抗戰結束後，他到廣州參加了當地托派的組織，正式成為成員，並考入了中山大學，主修歷史系，課餘十分活躍，組織了一個群眾團體「海社」，成員有中山大學和其他大學、中學的同學數十人，主要活動是討論時事、歌唱及旅行；後因戰爭局勢緊張而解散了。

1949 年 8 月，君羊從廣州到桂林，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桂林市支部書記。嗣後黨團兩組織合併，他即擔當書記一職。

是年底，廣西解放，他鑒於斯大林黨殘酷

鎮壓托派的歷史經驗教訓，深知自己也會遭到拘捕，於是離開桂林。果然，當局在 51 年便逐步拘捕各地托派份子。他到湛江市一間小旅舍當服務員，但被人認出而加以逮捕，從此在一個長期內失去自由。

他被監禁後，在 53 年遞解到漢陽，與許多被捕的托派份子一起囚禁，「接受教育」。因為他曾擔任領導工作，被判 15 年徒刑；到 1957 年減刑 3 年，62 年刑期滿了，但仍須留廠就業，「勞動改造」。82 年底，獲釋返回南寧家鄉，才大體上結束了長達 30 年受盡折磨的生涯，展開他較自由的閱讀、研究、寫譯工作。其後，他與一位醫護女士結婚，第一次過著互相照顧的家庭生活，此時，已是 60 多歲而進入老年的人，人生最富精力的青中年時代已被糟蹋了！由此可見他為了追求人類解放的理想、堅持自己的革命信仰而付出的代價是多麼的巨大！

姜君羊在他生命的後期，曾經艱難困苦地努力筆耕，撰寫和翻譯出大量的政治性理論性有價值的文章，其中許多都已經陸續公開發表。例如在本刊，以前所用的筆名頗多：林子、林蔚、田人、田友、惠之…，交互替換，反映出他內心仍猶有餘悸，不想引起檢查官的太大注意而追查到他。直到最近幾年，他才較多地使用「蔚然」的筆名（在其他的刊物的署名是田淑）。從這許多著作中，可顯示出他的理論、政治水平十分高，這是他努力研讀馬恩列托主義的寶貴成果。君羊同志的永別，實在是我們、讀者以至社會的重大損失，特別不幸的是我們在 3 個多月內連續喪失了 3 位親密合作的老戰友，更是深重而難以承受的打擊！

2006 年 11 月 25 日

不屈的人 ——記共同勞改折磨三十年的老戰友姜君羊

李平

1953年，中共把中南區部份的托派押到湖北漢陽“勞動改造”，當中就有個姜君羊。解放那年他正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他深知斯大林殘酷迫害托派，置之死地而後已的歷史，畢業後就躲到湛江一旅館當服務員，以為可以逃過這場災難，那曉得一下子就被當官的中大同學認出，於1951年3月就被逮捕。兩年後也被押到漢陽勞改。

一起勞改的有男的20餘人，女的4人，男的被押到漢陽磚瓦廠勞改，女的在武漢監獄布廠勞改。這些人當中，大部份是大學生，如廣州的謝越秀在上海滬江大學會計系畢業，省糖業公司會計主任；陳景光航空公司會計；何若平交通大學畢業；林松棋中山大學助教；廣西的徐太興是西大助教；肖靜放、駱春柏、雷潤清西大畢業；何春華某中學校長；黃德楷曾任《南寧商報》總編等。我們這些人都已被關押一年多，個個臉黃肌瘦，幾乎不會走路，被押到磚瓦廠去挑泥巴。我們每天從附近的小山坡挖土，然後挑到小鐵軌邊，由運土車運到磚機房去制磚。每人的定額是兩平方米，要挑百多擔，個個都被壓得筋疲力盡，一旦休息，就倒在地上。姜君羊身體還算好的，盡自己的力量去為社會建設勞動。

白天搞了一天艱苦的體力勞動，晚上還得

學習兩小時，叫做“批判托匪，改造思想”！幹部訓話，都是托匪如何如何反動的話，叫人聽了真真的難過！我們都是出生入死，參加革命鬥爭，如今卻成了共產黨的罪人！但想到我國有一句老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幾千年來的帝皇就是如此，如今共產黨勝利了，就是皇帝，托派沒有勝利，就是流寇，就是匪徒！所以任由他們去罵吧，有什麼辦法呢？林松棋堅決不承認托派是匪，挨批受鬥，最後被關押到禁閉室，後來沒有了消息，聽說不久就已死去！大家並非怕死，而只有採取政治上悲觀消極，人云亦云，敷衍應付的態度。姜君羊則更裝得糊塗，有一次發言，竟然希望馬克思到中國來看看，還不知道馬克思早已不在人世，當時連在場的幹部也說他糊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從此以後，姜君羊就多了一個“姜糊塗”的別號，有的幹部也叫他“姜糊塗”，老姜也樂得在學習中裝糊塗，東拉西扯。其實老姜十分清醒，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只好自己空下來看看馬列書而已。

54年長江大水，廠房被淹，勞改隊住到山上，天天去修堤壩，水退後回廠當泥水小工修廠房。恢復生產後，幹部看到我們這小分隊的人個個踏實勞動，又有文化，便全部調到原鐵工班後擴建為機修車間去，有的學機工，有的

學鉗工，老姜卻一直分配到最艱苦的鑄工翻砂去。那時候的勞改廠又沒有什麼防護設備，每次開爐常燒傷了手腳。磚瓦廠也迅速變成塑膠廠，西大的化學系助教徐太興搞了個化驗室，大量收購廢塑膠，生產塑膠涼鞋，推銷到全國各省。

在我們小分隊中，老姜和我刑期為 15 年最長，其餘多是五年至十年不等。到 1956 年，幹部再沒有喊“托匪”，並口口聲聲對我們說：“你們的案件今冬明春就要解決。”那年開獎懲大會，五年的一律提前釋放，女的五年以上的也都假釋，老姜和我都減了刑，他減 3 年，我減 5 年。但後來中共政策越來越左，什麼“今冬明春解決”根本沒有這回事。老姜和我差不多同時於 1962 年底和 63 年初刑滿，但沒有釋放回家，不准回南寧或上海大城市，還得留廠“就業”，繼續改造！只從勞改監獄搬到就業宿舍，每月發給你一點工資，在食堂吃飯。星期天經批准可以到城裏去走走。家在外地的每年有半個月的探親假期。徐太興五年刑滿後，由於工作需要也留廠就業，在就業隊繼續接受改造。

在那漫長被管制的歲月裏，我們忍受極大的悲痛，堅持自己的信念，永遠追求馬克思主義。老姜一有空就埋頭讀馬列原著，學習英文。但多少年來，他從沒有在就業隊的壁報上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在一起即使星期天到徐太興家裏玩，也不便正面討論什麼。雖然我們長期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生活，但還是過得自自然然的，特別是老姜他為人嘻嘻哈哈，又喜歡燒小菜，天冷時我們有時星期天到郊外去買來半條狗，然後由老姜用各種配料，燒成一大鍋美味狗肉，參加的人人各一大碗，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歡樂與共。

直到改革開放多年後的 1983 年，老姜和我才先後准予回南寧和上海與家人共同生活。但我們在勞改廠就業二十年，那時已六十多歲，卻沒有退休勞保，每月只拿 45 元的生活費，看病不能報銷。這點子生活費，我們稱之為“開水費”，這些年來，老姜一直靠親朋友好的支持和幫助才安然渡過的。他的弟妹後來還幫助他與一位死去丈夫的護士結為老伴，互相照顧，聽說他對老伴只提出一個條件，就是：當我看書或寫作時，你絕不要打攪我。

與在勞改隊裏裝糊塗，三十年來從不寫一篇文章相反，回到家中自由的環境裏，老姜決心認真讀書寫文章，他認為：“人們已經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了，當今重要的就是恢復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

（2003 年 4 月 3 日信）此後他在《陳獨秀研究動態》等刊物發表過多篇文章、編譯稿和出版論文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與思考》（2004 年出版）。

這位不屈的人，總結自己的一生寫下四句話：

堅持原則，反對守舊；

服從真理，不搞教派；

放眼世界，把握現在；

團結戰鬥，爭取未來。

2006 年 11 月 28 日記於病中

安倍政權粉墨登場

趙京

九月二十六日，以“建設美麗國家”為旗號的日本安倍晉三新政權正式成立。除了自民黨內部各派系的論功行賞外，安倍也塞加了與他親近的右翼國家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士。例如，它設置的五個“輔佐官”（國家安全、經濟財政、朝鮮綁架問題、教育再生和廣報宣傳）就是典型的代表。安倍模仿美國白宮的能集中資訊、快速決定的機能，加強首相官府的權力。

從短期來看，安倍首先必須打破前任小泉純一郎留下的對中、對韓外交僵局，收斂起未當首相之前的露骨右傾軍國主義言論，獲得了於十月訪問中國、韓國的機會。就在安倍出訪期間，傳來了朝鮮進行核子試驗的消息，這將加速日本在安倍執政期間向右傾軍國主義的轉變，特別在如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一、在未能修改憲法之前，踐踏憲法，以政府的正式立場允許日本行使“集團自衛權”。所謂“集團自衛權”，實際上就是在美日安保條約下把日本“自衛隊”派往世界各地的權力。日本憲法第九條本來明確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但日本政府以“專守防衛”的藉口建立、擴張世界第一流的海、陸、空軍“自衛隊”。現在，正如安倍把自衛隊侵佔伊拉克贊為“歷史上的偉業”一樣，日本的自衛隊不僅只限於保衛日本，也可以用於“保衛”與日本結盟的“集團”（目前日本的軍事同盟國只有美國）。例如，當日本的盟國美國自稱受到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首先發動戰爭“自衛”時，日本基於“集團自衛權”也可以與美國一同參戰。

二、完成小泉任期內未能通過、保留“繼續審議”的“共謀罪”法案。此法案的根本性質就是製造“警察國家”那樣的監視社會，使人們在思想、言論上都制約自己，遠離任何反對政府的行為、活動。日本政府以“國際組織防止犯罪條約”為理由推動“共謀罪”法案，但據日本律師聯合會的調查，連美國都以各州法律不同為理由對此條約的第五條有所保留，並沒有強制設立“共謀罪”。如果

“共謀罪”法案通過，安倍政權將進一步推行電腦通訊監視法案，把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通訊秘密”的自由也踐踏掉。

三、修改教育基本法，限制民主、人權的內容，突出“愛國心”教育，把拒絕演奏、齊唱“君之代”（天皇國君千秋萬代）國歌、起立致敬“日丸”國旗的教師開除出學校。這在以石原慎太郎為知事（市長）的東京都特別突出。值得慶倖的是，九月二十一日東京都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十六部判決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強制演奏、齊唱“君之代”、起立致敬“日丸”是違憲、違法的，必須向受處分的教師、學生支付慰問金。可以想像，安倍政權會多麼急迫地想修改現在的教育基本法，讓法律為國家權力服務。

四、修改勞動基本法等勞動契約法規，特別是在就業保障方面，把創造了“日本奇跡”的帶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日本式資本主義轉換成自由放任的英美式殘酷競爭體制，配合日本在政治上的進一步右傾、軍國主義化。

五、日本統治集團已經成功地在“冷戰”結束後壟斷性地控制了國會等立法機構，自民黨、民主黨、公明黨等已經佔據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足夠修改現在的和平憲法。當然，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還牽制著日本統治集團立即修憲的企圖。安倍任內，可能會完成“修憲程式”法案，同時也進一步誘導國內輿論，為下一個政府的正式修憲開路。

朝鮮被逼入“核武器試驗”的死角，正是華盛頓的帝國主義、東京的軍國主義和北京的一黨專政造成的惡果。實際上，由於美國深深陷入阿富汗、伊拉克侵略戰爭泥潭之中無法自拔，又得加緊對伊朗的威脅，沒有能力對應朝鮮危機。只有日本不顧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自行實施制裁。以“核武器威脅”為藉口的安倍政權將會更肆無忌憚地推行極右強權的軍國主義政策。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寫於美國聖拉蒙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Comparative Policy Review, October 2006）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號召群眾

動員反對八國峰會

蔚然編譯

〔編者按：蔚然(姜君羊)同志在他的嚴重心臟病發而去世之前幾天，收到我們寄給他的外文資料後，仍奮力為本刊譯出以下此文並即寄來，又一次體現出他的忘我工作、非常負責的熱誠，他的永別是無法補償的損失！〕

下一次八國峰會將在 2007 年 6 月在羅斯托克附近的巴爾狄聖地召開，在愛丁堡和聖彼得堡的八國峰會之後。貧困、債務、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人民民主權利的被侵犯和攻擊，這一切大災難就是每一年的八國峰會制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欠下的罪惡帳單。

八國峰會比其他國際組織更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要求。一個只佔世界人口 13% 的工業國家集團在秘密會議上為其他國際組織提出決議，認為通過這些決議就能控制其餘的國家。事實正是這樣。那個國家為最大的金融中心所控制，那個國家以最大的跨國公司為基礎，那些億萬富翁對那個國家的自然資源的佔有就愈是貪得無厭。

因此，在雅典開的歐洲論壇社會運動大會決定舉行大規模的全歐洲反對八國峰會的抗議示威運動。

參加歐洲反對資本主義左派的政黨和集團宣稱：它們是反對八強國和它們政策的廣泛的全歐人民聯盟的組成部份。但它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衛人民的權利和生活環境不使遭到八強國及它們政策的破壞，而且還為了建立另一個社會，這個社會要建立在和平，不要戰爭；要團結，不要互相傾軋；要平等，不要歧

視的基礎之上。

歐洲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發表宣言號召歐洲所有左派和進步民主人士都來參加 2007 年 6 月在羅斯托克舉行的抗議示威運動。宣言的主要內容如下：

(1) “向歐盟挑戰”

宣言認為：“法國和荷蘭的公民投票否決了反民主的歐盟新自由主義憲法，這是對軍國主義者計劃的一次沉重打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工人和青年們不再接受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最終的社會形態的見解。這祇要看看全球化、非地區性和私有化的情況，就可以清楚了解市場和競爭的價值的。

“否決歐盟憲法就是批准反對統治精英們獨斷獨行的權力。不能讓這些統治精英們把人民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戰爭才獲得的普選權和所有民主權利當成兒戲來加以嘲弄。

“法國和荷蘭全民投票的結果表明了人民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最深惡痛絕的反感。在當前伊拉克戰爭和企圖通過北約使歐洲軍事化的情況下，我們反對任何對伊朗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

(2) “從投票箱說‘不’，到街道上說‘不’”

“法國和荷蘭否決歐盟憲法是過去幾個月來歐洲社會鬥爭運動達到的最高水平。在投票箱拒絕新自由主義正在轉變成在街道上強有力的社會運動。歐盟的里斯本和巴薩隆那計劃以其反社會的效果受到了廣泛的抵制。在

2006 年 1 月，由於歐洲人民動員起來，對歐盟議會施加壓力，使得碼頭工人能夠挫敗使港口服務自由化的計劃。”

“整個歐洲群情激奮，新一代的抗議示威者都確信以另一種選擇來取代新自由主義是必要的。”

(3) “準備好不同的政治選擇”

宣言聲明“歐洲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全力參加社會運動和工會運動。我們支持一切反對新自由主義計劃的所有進步力量的團結，即使是由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或新自由主義勞工政府發助的。”

“我們的目的不止是保衛我們的權利，我們的生存環境和我們的未來，我們要建立一個愛和平而不要戰爭，要團結而不要爭奪，要平等而不要歧視，要愛護而不要破壞生態環境的新社會。這也就是我們在選舉中堅持的政治民主和社會進步的綱領基礎上的新社會。我們反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歧視，和其他的種族歧視。我們拒絕任何折衷方案，這些折衷方案只能給工人、青年、婦女和移民帶來災禍而使資本主義得以鞏固。”

(4) “反對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多國公司的所作所爲”

“玻利維亞政府合理合法對本國原油和煤氣工業實行國有化遭到歐洲右翼政府和多國公司的強烈反對。參加歐洲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和社會運動團體支持玻利維亞人民和其他被壓迫的拉美人民有權使用本國資源的鬥爭。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的任務就是在自己本國開展反對跨國公司的鬥爭”

(5) “反對戰爭，反對歧視移民”

“社會鬥爭和反戰是緊密相連的。新一輪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顯現。美國政府宣稱它的目

的是要推翻德黑蘭的毛拉政權，把伊朗核力量問題當成是中心問題，而歐盟，特別是英國、法國和德國政府在美國發動戰爭的戰略中充當了幫兇。

“反戰的群眾運動應當到街上去，同巴勒斯坦人民團結一致，反對那種空口說白話的歐洲援助。

“新興的和平運動要反對有種族歧視和排外偏見的社會集團野蠻排斥移民和泡制伊斯蘭恐怖症。歐洲各國政府都在制造種族歧視和排外偏見的氣氛，提出新的區別對待種族和外來移民的計劃，在所謂「堡壘歐洲」(FORTRESS EUROPE) 的邊防問題上，提出一項可恥的政策，把移民問題當成是國家安全問題，而把移民本身當成是罪犯來對待；因此造成了仇恨和恐慌。這就是我們左派政黨全心全意爲和平，也爲移民的平等權利進行雙重鬥爭的原由。”

(6) “向著建立全歐洲新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前進！”

“拒絕歐盟憲法使 4 億 5 千萬歐洲人民認識到反對歐盟的鬥爭是全體歐洲人民的共同鬥爭，剛剛結束的雅典社會論壇，繼承先前的社會論壇，指出了走向新歐洲的道路。新的鬥爭，新的經驗和新一代人對歐洲反資本主義的左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們排除歷史的和文化的差異，加深我們之間的合作和緊密聯系。

我們支持在全歐洲建立能夠推翻新自由主義的新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多元的力量。這就是我們的承諾。”

2006 年 5 月 19 日於聖丹尼斯在這份宣言上簽字的有葡萄牙、加泰隆那、西班牙、德國、法國、土耳其、丹麥、英國、蘇格蘭、瑞士等國和地方的左派政黨和組織。

摘譯自「國際觀點」381 期

關於拉丁美洲局勢的解說

薩巴度著

蔚然譯

(1) 拉丁美洲在向左轉。最近幾年，由於抵制新自由主義和群眾抵抗運動相結合，其中的某些形式已造成了革命前的形勢；在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傳統的右派在一系列的選舉中遭到了失敗。下一次很可能輪到墨西哥、秘魯和尼加拉瓜的右派了。哥倫比亞是唯一的大國，它的反動的右派很可能在秘密的半軍事組織的支援下繼續執政。

(2) 這樣的局勢引起了資本主義內部新的矛盾，特別是同美帝國主義的關係尤為緊張。留給布殊政府和多數國家的右派的選擇只能是“對抗”，甚至可能採取軍事干涉的辦法，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平原周邊的國家，已經有美國的軍事顧問在那裏出現。但在當前，美國的戰略已陷於伊拉克、中東和中亞細亞的困境中，它已無力顧及拉丁美洲。儘管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它通過軍事方法佔領伊拉克已證明為十分困難，更何況要佔領別的拉美國家呢！

(3) 統治階級的“第二個選擇”是：讓新的左派政府沿著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的道路，重新組織它們的階級統治；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我們看到巴西政府依靠農業出口資本家的利益，並按照它的政策，尋求世貿組織（WTO）的力量，依照更加拉美一體化的政策來重組原油、汽油、水等資源市場，使資本家從近年的 9% 利率不斷提

高中獲得利益，並在巴西工人黨、阿根廷的新庇隆主義和烏拉圭的 Frente Amplio 的幫助下使社會運動的徹底性改革變得對他們無害，這些新政府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已經起到一定程度的“穩定”作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阿根廷的基什內爾政府。

這些政府解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並不成功。自由主義還在反對改革社會的不平等有增無已，老百姓的狀況並沒有得到值得注意的改變，而且，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構中，這些政府雖然向帝國主義頻送秋波，但卻無法在中期或長期實現自主的政策。而它們卻一直遵照金融市場、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命令，如同 MERCOSUR 那樣推行地區政策，試圖為本地區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爭得新的陣地。

(4) 無論統治階級採取“對抗”或“選擇自由主義”的辦法，都碰到了實際存在的社會運動這個巨大障礙。社會運動每一次都以新的形式出現：在阿根廷有工人運動和 Piqueteros(接管)運動，在巴西有無地農業工人運動和不顧工人領導的政策而興起的工聯主義運動；在厄瓜多爾有原住民運動和它們的組織。

在南美洲大陸，妨礙穩定的兩個主要問題是：“玻利瓦人的革命”和玻利維亞的局勢。在拉丁美洲的左派中，除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和需要把大陸的所有國家實現一體化的 ALBA 計劃(注)要討論之外，要討論兩個實際問題，即

盧拉和基什內爾一再提出的社會自由主義問題，和查韋斯的玻利瓦人革命進程的問題。無論是與美帝國主義對抗的政策，或者是一系列社會的和民主的計劃的實施，如保健、教育、反對饑餓的計劃，某些商行和土地的佔用，住房政策，合作化，特別是千百萬委內瑞拉人民更進一步的動員和分化，這些都是本大陸的熱點問題。

由查韋斯論及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問題開始的辯論，使用上述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的辯論更加熱烈了。而問題的辯論還浮於表面。無論怎樣，玻利瓦人革命進程的一系列問題，首先總是和查韋斯政權的“邦拿巴主義”連結在一起：權力的集中，查韋斯與群眾的直接聯繫，真正的政黨的缺如，常常是爲了競選才組成政黨，號召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常常受到當權者的欺騙性的有限的群眾民主和工會的阻撓。

例如國家石油公司（PVDSA）管理部門罷工之後，鬥爭的進程已提出了自我管理的問題，而行動上卻沒有跟上，相反，技術專家們卻後退了。古巴共產黨的政治表現，在有關擴大民主、控制和合作管理的問題，卻充當了反動的角色。又如在鬥爭中已經提出由石油收益提供政策基金來滿足人民群眾在保健、教育和食品的基本需要這樣雄心壯志的目標時，卻沒有對委內瑞拉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作出實質性的改變或侵犯。

未來兩年將決定委內瑞拉革命進程。查韋斯常常引用托洛茨基的話，並加以解析，說“革命必須鞭答反革命”，玻利維亞的革命就有反對右翼反革命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印記，所以，革命的進程每一次都表現得激進化。

沒有人懷疑，如果出現由“盲目的右派”

挑起別的對抗或新的挑釁，這就意味著革命進程將會進一步激化。但右派和布殊政府會從他們失敗的政變中吸取教訓：他們會採取拒絕參加即將到來的 2006 年總統選舉，使查韋斯政權非法化；另方面也可以採取阻塞所有社會經濟活動，使國家陷於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查韋斯和他所有的支持者一定要按照人民群眾的民主和社會經濟要求組織力量來加深革命的進程，爲此只從石油獲得收益是不夠的，必需作新的政治選擇。

（5）這是一齣國際主義戲劇要在委內瑞拉演出。許多評論家把莫拉萊斯視爲界于盧拉和查韋斯之間的人物。事實上，玻利維亞副總統雖然曾宣稱“需要爲印第安人的資本主義作個計劃”，而莫拉萊斯原先的計劃卻是將他推向查韋斯，解除了舊的軍隊參謀部，把它趕到牧場去，還自願削減總統工薪 75%，所有政府高級官員都照此辦理，同無地農民運動進行談判和進行土地改革。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革命運動的領導方面，在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之間的情況是不相同的。在委內瑞拉，查韋斯完全是歷史進程的產兒，他在政治上只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而且還限制了群眾運動的範圍。

在玻利維亞，到目前爲止，群眾運動都是由莫拉萊斯發動的，比如在號召立憲會議和天然氣資源的國有化問題上，他的立場是由群眾運動的要求直接形成的。他會遵守他的承諾嗎？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在這個國家，我們找到了在拉丁美洲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制高點。在未來的幾星期或幾個月裏，事情如何自見分曉。局勢還懸而未決，群眾運動的壓力依舊，在政治上，行政上和制度上是一片混亂，

很可能就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裏，找到解決拉丁美洲局勢的鑰匙。

(6) 從國際的觀點來看，有一系列問題還難以逆料，這包括雙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傳統右派，另一方面是人民，同反對帝國主義的政府（如古巴、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之間；其次是社會自由主義政府（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智利、厄瓜多爾）同前面所說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政府之間的分化。盧拉和基什納爾正在迫使查韋斯和莫拉萊斯向右轉變。盧拉、基什納爾與查韋斯也存在鬥爭，都在爭取莫拉萊斯。拉丁美洲的左派正面臨這樣的選擇：是與自由主義一起反對改革，還是同帝國主義決裂？是盧拉還是查韋斯？這一切都有賴於美國的對抗政策同群眾運動的力量對比。

(7) 拉美的局勢（使我們）在政治上和綱領上作出如下（決定）：

甲，（把在拉美的工作）與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鬥爭一起作為團結行動的中心發展同玻利瓦人的革命鬥爭的國際團結，推進委內瑞拉的集體事業，組織團結集會，派遣救援和突擊隊，國際的和第四國際的組織一定要站到鬥爭的前列。

乙，在綱領方面，把社會綱領和依據每個國家的民族和人民對自然資源、土地和財富擁有主權的民主要求，同土地改革結合起來。公共投資和煤礦炭、天然氣資源的國有化是這些國家社會和政治要求的重心。民主問題，無論是清除腐敗的政客，還是加深革命的影響，例如在委內瑞拉或玻利維亞，對商家提出的控

制、合作經營或管理的要求，都應優先予以考慮。

丙，最後，由查韋斯發起的在委內瑞拉，同樣在整個拉美大陸，連系社會和政治局勢，開展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機會。

儘管玻利維亞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的國家地位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它的革命經歷卻使它能夠重新開展社會主義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在今日的所有組織中已經開展了，而且這還不只是剛剛開始。當然，有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但在某一思想意識的環境中，社會主義的討論，在 90 年代初，第一次以“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點？”為主題作為標誌的；在 1990 年，和 21 世紀初，則以反對自由主義為標誌。而查韋斯則以社會主義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相對抗作為主題，在拉丁美洲社會和政治的先鋒組織中，以親身的經歷來提高思想覺悟，這些都會影響到一系列戰略問題。

在左派反對社會自由主義的鬥爭中，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轉捩點，它把人民大眾的要求作為反對自由資本主義，堅持改革的戰略中心問題，得到滿意的處理。

2006 年 5 月

（注）ALBA——這是莫拉萊斯、查韋斯和卡斯特羅共同簽署的美洲替代發展方案的協議。

蔚然節譯自

<http://212.67.202.147/%7Evivnet05/article>.

委內瑞拉阿卡薩鋁廠的合作管理

蔚然 節譯

費比里斯·托瑪斯作為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的代表出席委內瑞拉革命社會主義黨（PRS）組委會會議。他訪問阿卡薩鋁廠領導班子中負責經濟發展的拉法爾·路特里戈斯。後者向他介紹了阿卡薩鋁廠的合作管理（Co-management）的情況。托瑪斯報導說：在2005年伊始，查韋斯總統任命卡洛斯·蘭茲為國有阿卡薩鋁廠公司的頭頭。這是驚人之舉。蘭茲以前是個游擊隊員，而今是一位與革命左派有關係的社會學家。他來到公司總部，便開始推行合作管理，作為公司的樣板和全國的試點。

據拉法爾·路特里戈斯的介紹，阿卡薩鋁廠是一家最適於改變管理制度的工廠，可以在這裏取得經驗。在過去的17年間，該廠因為貪污和腐敗，年年虧損，使它陷於破產，虧損使得重新調整工藝技術十分困難。而公司破產，卻成了那些挾著公文包的先生們研究的課題，他們提出了挽救計劃。但除了為這些先生們支付數百萬薪酬之外，什麼都沒有改變。

路特里戈斯說，他們來鋁廠的目的是在工人們的幫助下挽救該廠。同卡洛斯·蘭斯一樣，他們相信通過實踐和行動，工人們能夠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他們建議在阿卡薩鋁廠實行合作管理制度。他說：我們絕對不會如同德國那樣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意圖，但在策略上我們會採取社會民主和社會改良的名稱，而這祇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合作管理達到自我管理。這就是說，我們用合作管理同工人一起管理工廠委員會，給予工人對生產、分配和經營的全部權力，目的就是發展和生產更多的產品，同美國以外的雇主做生意。當然我們也要發展國內市場。對於我們來說，合作管理具有和平和漸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意義。我們反對建設一個高踞於群眾之上

的社會架構。為此我們創立了社會政治訓練中心，使工人們都加入到行動中來。我們給這些訓練中心取了各種名稱，如共產主義問答中心等，漸漸地工人們都參加到訓練中心來，現在參加訓練中心已有數百名工人。我們要不斷增加自願參加訓練的工人。

關於公司的所有制問題，路特里戈斯說：公司的所有權仍屬於國家。我們並不實行合作管理就把公司的資本分給工人，或者組成工人集體資本，或者在工人中分配股份。在委內瑞拉，個人佔有國家公司是不實際的。國家完全擁有土地、石油、大公司等資源和經濟組織，這是社會主義意義上重新分配和重新改組的重大問題。我們不能把合作管理設想為僅僅限於某公司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整個社會範圍的所有問題，包括軍隊問題。在這方面來說，我們還沒有做得更多。

談到該廠工人和指導者有權處理什麼問題時，路特里戈斯說：當我們來到這裡時，有人對我們說要解雇所有生產領導人和指導員。我們說“不”，“那是我們最後要做的事”。國有石油公司（PDVSA）的老闆搞破壞，一下子解雇2000多生產管理人員，使這些人陷入困境。如果我們也這樣做，我們不可能在所有的崗位培養出查韋斯式的領導人，這會帶來極大的災難。

我們從基層每個工場、每個車間、每個工作組經由直接選舉選出對工作負責，可以撤換和輪換的“代言人”。我們用各種方法進行工作，爭取信任，通過開會、傳單、新聞傳媒、討論等等。經過幾個月之後，工人們看到我們所做的都是和他們的利益相關的事，都來參加了，從而取得了公司的“權力”。我們也在公司管理的層面上推行選舉制度。公司的領導小組大大擴充了。有300個“代言人”代表是工人從普通群眾中選出來

的。如今，每個部門都有自己選出的“代言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所有有關問題都在管理委員會討論和作出計劃。有問題要作出決定時便召開會議討論，在會議上，指導者向工人代表提出計劃，工人代表則就計劃提出意見。指導者不能單獨作出決定，而必需考慮工人的意見。

至於合作管理形式將來是否會在全國推廣，路特里戈斯認為這個問題還不會予以考慮。但他說：我們感覺到在經濟上、政治上，我們都在向前邁進：生產增長了，生產率提高了。我們有雄心壯志的生產目標：建設五條生產線，重新部署

生產等等。

在政治方面，我們要同查韋斯總統協調一致，他曾說過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要終止資本主義關係。

路特里戈斯還說：在我們的國家，基礎工業是工業的心臟。合作管理在好些其他公司也在施行中。我們同其他實行合作管理的企業保持聯系，召開會議或通過其他方式保持接觸，我們熱切地關注著事情的進展。

蔚然編譯自《國際觀點》網站《拉美 2006》特輯

關於委內瑞拉和革命社會主義黨

——訪問斯達倫·佩雷斯·波爾格——

蔚然 譯

斯達倫·佩雷斯·波爾格（Staline Perez Borges）是一位工會領袖，也是長期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的戰士。他全部心思都放在委內瑞拉革命鬥爭中。他是現今委內瑞拉新的最大的工會聯盟（UNT）四個全國協調員之一。他還是正在籌建中的新政黨——革命社會主義黨（The Party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izm，簡稱 PRS）的創建委員會的一位成員。第四國際的費比里斯·托瑪斯（Fabrice Thomas）訪問了他。下面記述的就是訪問的情況

問：請問現階段委內瑞拉革命進程怎麼樣？

答：革命仍在繼續進行，但存在矛盾。它正遭受腐敗和無能破壞著。在最近的市和地區選舉中，查韋斯黨的一般群眾同領導集團之間就存在衝突；領導集團官僚主義強行提出他們的候選

人。在目前，革命進程中存在的實質性矛盾就是同保守的官僚主義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在將來特別是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變得緊張之時，（革命人民）同保守的官僚主義政府集團之間的矛盾就會變得尖銳和直接。這就會使革命進一步深化。

問：工會方面情況如何？

答：2002 年 4 月發生反對查韋斯的政變，老闆們便封閉油田。而在 2003 年開始，舊公會聯合會（CTV）公開叛變，這使工人們明白了必需把工會組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樣在全國範圍內，從基層開始出現了重新組織全國的工人工會聯盟（The National Worker's Union，簡稱 UNT）。它是當今包括了全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在內的工會聯盟。UNT 強大而有力。

在目前，還很難用數目字來表示這個新的工會聯盟（即 UNT）的真實力量。但可以說 UNT 擁有好幾個超過 100 萬會員的工會組織。在 UNT 中，存在著四種政治傾向，這就是包括許多貪污和不稱職的領導者在內的官僚主義部門的改良主義傾向。另一種傾向是波利瓦工人力量（Bolivarian Worker's Force）。它接近政府，也是一種改良主義傾向。再就是階級主義者（Classiest Current），它的許多幹部參加了最近組成的革命社會主義黨（PRS）。〔第四種政治傾向，被採訪者沒有說明，可以設想就是以被採訪者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編譯註〕。

問：請講有關革命社會主義黨的一些情況。

答：革命社會主義黨的建立是 UNT 內部鬥爭的結果。在全國各地召開的 UNT 的會議上，參與者大多數都要求組織同第五共和國運動（MVR）、PPT（即 Patria Para Todos）、Podemos、共產黨以及其他支持查韋斯的組織相區別的力量。鑒於這一需要，我們決定創立革命社會主義黨。我們認為當前的形勢下，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獨立自主更好地規範反對帝國主義的計劃，需要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組織。

在我們這方面，有人指責我們這個計劃。我們要實現兩方面的任務。把 UNT 建設成不依賴政府和政黨的獨立的工會聯盟，也要為工人階級建立一個政黨。

關於建設革命社會主義黨的討論，現在有五個政治集團在進行。其他的一些組織也在補充和充實我們的政治綱領。我們希望今年（指 2006 年）伊始能夠正式宣告 PRS 的成立。我們正在籌劃成立

大會，我們擁有一份報紙，叫“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Option”）我們的組織計劃包括：7 月 9 日在加拉加斯召開有 450 人參加的全國會議。我們在全國範圍組織或準備組織其他會議宣告建立新政黨的必要。我們要制定一個政治綱領作為討論的基礎。

當今領導革命進程的集團都是改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或極左派分子。他們都不反對政府的官僚主義。

為了確保人民群眾要求的改革，必須有普通群眾的最大參與。廣大人民群眾要取得一定的權力，這是革命進程具有的特性使然。無論是領導者、要想強加給群眾，要他們做這做哪是不再可能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腐敗和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已顯示出對於國家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義。例如合作管理（Co-management）就是要工人直接參與管理國家和私人的企業。

某些政府官員認為合作管理有風險；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如國有石油公司（PVDSA）必須由國家領導人來控制。實際上，他們是害怕一般群眾參與管理。我們進行了許多工人參與管理的試驗。給普通群眾權力，這是革命向前發展所必要的。

查韋斯講過給人民群眾權力。好呀！權力就是管理工會，管理社區，管理你所選出來的人。這就是革命社會主義黨能夠在工人中獲得巨大影響的原由。我們對建立革命社會主義黨懷抱極大的希望，目的就是儘快使委內瑞拉向前邁進，這是從單純宣告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而採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實際行動。

了解帝國主義：過去與現在

舊和新的統治方式

大衛·麥克納利 著

兆立 譯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進入“帝國主義的一個新時代”了。複雜的世界貨幣市場的興起，越來越互相協調的全球生產系統，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這類的組織所強加的極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美國的好戰的軍國主義——所有這些都被認出是資本主義帝國的新模式。

對激進左派中的一些人而言，這個新帝國主義卻激發了他們重新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際左派各主要人物所詳細闡述的分析。這理由不難看出。在那段時間中，許多本關於帝國主義的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出現了，其中最主要的有：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的積累》（1910年），布哈林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1915年）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7年）。

這三本書，雖然有不同之處，但是共有好幾個真正優點。第一，每個理論家都試圖把歐洲列強（以及美國和日本）的領土擴張與資本積累過程聯繫在一起。他們認識到，那個時代的帝國主義之所以這樣做，〔即領土擴張〕，不只是推行一個政治政策，而且是與資本積累的戰略直接有關的。

第二，爲了證明這個聯繫，他們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盧森堡的書中，朝向那個戰爭的推動），認爲這個戰爭在本質上是一次資本主義的衝突，是世界資本主義不斷競爭的血腥的使人震驚的表現。

這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家寧可把這次戰爭解釋爲資本主義競爭的一個極端形式，而不把它描

繪爲一次歷史的意外事件。他們認爲，貿易戰最終是要通過真正的開火來解決的。布哈林說，最後分析起來，經濟上的衝突的解決是要“靠軍火的力量……所以最後的贏家是軍事技術最好的一方”。

最後一點是，由於以上這些分析的結果，這三位革命作家都以堅決反對全球軍事衝突的立場而受人注目。當時在歐洲各主要的社會主義政黨都轉而支持它們各自的政府的戰爭政策——因而出賣長期所持有的對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的承諾——的時候，這些革命理論家卻與反戰左派的積極份子走在一起，保存了國際團結的榮譽。

雖然有了所有這些成就，可是，這些理論也真正是有局限的——特別在今天，這些局限已變得會礙事了。首先他們所提出的對資本積累的分析就有相當大的缺陷。例如，羅莎·盧森堡認爲帝國主義是以在資本主義世界之外尋求新市場爲基礎的。

她認爲，如果資本主義的商品沒有國外的新市場，資本主義本身就會由於反覆出現的生產過剩而崩潰。可是，不但現在沒有什麼證據顯示新的殖民地構成重要的出口商品市場——考慮到這些殖民地的貧窮，它們怎麼可能呢？——而且當時盧森堡也沒有理解到資本主義的密集增長和外延增長的能力。

簡單地說來，資本主義經常在所謂“發達世界”之內爲消費品和資本貨物——不管是爲快餐食品或者電腦——創立新市場。雖然爲密集增長和外延增長這兩種增長都找到市場

是比較可取，但是爲後一種增長服務的市場的消失並不一定是表示資本主義的末日已到。

列寧的分析也有真正的缺陷。例如，他認爲，殖民主義是以過剩資本——即無法在本國作可獲利的投資的資本——之輸向殖民地爲中心的。

可是，他在他的小冊子中所列出的圖表上卻顯示大部份的外輸資本是從一個富裕資本主義國家輸到另一個富裕資本主義國家——它到現在還是這樣做。至於布哈林，他以二十世紀初期的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資本與民族國家的融合的統計資料爲根據，將它擴張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趨勢，再爭辯說，資本與國家會漸漸地結合在一起的。可是，近年的私有化和撤消管制的浪潮卻指示，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係是更有流動性、更易變化的。

但是，這些帝國主義論的最大缺陷，也許是他們把列強之佔領領土看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特徵。這理由不難看出。從大約1875年開始，列強就拼命爭奪殖民地。

在那以後的四十年中，英國爲它的帝國增添了400萬平方哩的領土，法國增加了350萬平方哩，德國、意大利和比利時也各自增大了100萬平方哩。

在這個時候，在世界制度中所擁有的權力的大小就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所控制的領土有多大多好——以及在這領土上所含有的土地、資源、市場和勞動力等有多豐富。

因此，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戰爭，就變成一條可被用來在全球制度中積聚更大力量的戰略——一條對德國及日本這些在上段時期沒有能夠變成重大殖民帝國的新興列強特別有吸引力的戰略。考慮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盛與領土的征服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盧森堡、列寧和布哈林之把列強之間爭領土之戰看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特徵，是不難理解的。其實，列寧把這種戰爭描述爲“絕對不可避免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20年之後被第二次

世界大戰所跟着的時候，這第二次戰爭似乎証明了他們的評價的正確。可是，雖然當年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因此認爲世界資本主義需要領土的擴張，而且始終不變地製造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歷史的發展卻是變幻莫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在二戰後的三十多年中，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出乎大眾的意料——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變得獨立了。但是，統治世界的方式都漸增地依靠市場力量，不依靠領土的佔領。

在這裏，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跨國公司的興起。這些跨國公司的總部雖然設在某一國家，但是它的業務卻遍及全球。這就可以使富國的資本家利用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和原料，作爲綜合生產過程的一部份。這就允許西方公司不必招致殖民化某一領土時所花的金錢和所負的風險而剝削地球南方的窮苦人民。同樣的原則也應用到把財富從地球南方抽走而流進地球北方的金融機構中來的、比較近代的、充滿爆炸性的全球借貸現象上來：這些形式的私佔剩餘也可以用主要是經濟的方法來實行。

正當領土的征服之作爲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模式逐漸消失的時候，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也逐漸消失了。在列強於30年之內（1914-1945）打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現在經過了60年都沒有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並不是戰爭本身已經消失了。恰恰相反！但是，戰爭的軌跡已經移轉到帝國主義國家與地球南方的人民之間的戰鬥，因爲後者不聽從前者的命令。越南就是明顯的例子。同樣原則也應用到美國戰爭機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進行的冒險，雖然每個地方的情況是不同的。

可是，緊要的是，這些並不是爲控制領土而起的戰爭。美帝國主義當然希望剝削地球南方。但是它寧願用經濟方法來這樣做，不要招致爲了建立新殖民地政府和佔領所要花的政

治和軍事的費用。它當然會作出軍事干涉。但是如果它不是爲了佔領而這樣做，那末今天什麼事物或什麼人物驅使帝國主義進行軍事干涉呢？

資本的帝國

對這個問題最有力、最有挑撥性的馬克思主義回應來自伍德女士（Ellen Wood）在她的最近的書《Empire of Capital》（《資本的帝國》）中。伍德女士在一次內容豐富的歷史分析中認爲，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不以佔領領土爲主的帝國主義形式，大概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

她指出，資本主義的剝削畢竟是建基在通過市場組織的經濟權力上。與封建領主不同，封建領主搾取剩值的能力要視政治級別（封建領主靠政治級別取得土地、收取地租以及控制莊園內的法庭）以及對軍事權力的獨佔程度而定，但是資本家不需要用擔任公職、司法或者攜帶武器等方式來剝削工資勞動者。

他們多半通過純粹經濟的方法來完成後一任務：財產的擁有和市場的力量。他們當然時時要求立法者、警察、法庭和軍隊來支持他們的統治；但是日常的剝削並不需要使用武力或法庭的干涉。

純粹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可被期望用同樣手法來運作——那就是運用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來積累剩餘價值，不是用政治管理或軍事控制的方法來佔領領土。

但是，這是不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不需要擔憂領土關係，可以完全忽視世界各地進行剝削、進行積累的實際空間和場所呢？絕對不是。

伍德女士反對各種時髦的膚淺的民族國家消失的理論。她堅稱，世界資本主義正越來越依賴以領土爲基地的民族國家網絡。世界資本與其鼓吹國家的解散，與其追求單一世界政府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前景，反而十分高興地與對互不相關的領土行使主權的各民族國家有

着密切的關係。

其實，國際資本依靠如此的國家網絡來執行財產權利，穩固金融交易，保證勞工的順從，控制社會不安等等。

伍德寫道，“全球化的本質是一個由建構在統治和隸屬的複雜關係上的大、小國家全球網絡所管理的全球經濟”。（原文在《Empire of Capital》第141頁）。

伍德女士認爲，民族國家網絡，如果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對資本的用處比過去更重要，因爲它，而且只有它，才爲剩餘價值的積累提供局部的先決條件。

那麼對戰爭的看法怎樣呢？在這個問題上，伍德又有一個新穎的見解。她並不認爲在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帝國中戰爭會消亡了。可是她卻暗示，在經濟上佔主宰地位的國家與也在經濟上佔主宰地位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再有利寧等人所認爲的必然性了。

在這同時，由於管治真正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永遠是個做不完的工作，戰爭還是會有的。又因爲人民的抗議，地區性的衝突和民族主義的起義，都能夠產生對帝國主義列強敵視的情況，全球化資本不能老是依靠小國來保證能促進平穩積累的一切條件。

所以，佔主宰地位的參與者有需要向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世界上對西方資本和西方國家的權力最敵對的那些地區——發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對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採取抵抗的行動是決不被容忍的。他們需要向世界宣示，帝國的權力——最主要的是美國的權力——將會在任何時候對任何地方進行干涉。

這就是布殊在9·11事件後在他的臭名昭彰的演說中所展示的立場。他在該演說中聲稱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國家會在美國的攻擊目標名單上。美國政府的官員在詳盡說明布殊的主義時宣稱，美國已進入不斷戰爭的狀況，“沒有時空的限制”。

伍德女士說，這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會引導我們走向的前景。今天的帝國主義

不甘願統治世界上某一地區，反而要對整個地球可讓資本主義積累的空間進行管治。

她寫道，“新帝國主義不尋求領土擴張或對貿易路線的佔領”。它要的是“對全球經濟有無限制的主宰，對管理全球經濟的各個國家也有無限制的主宰，〔有〕無休止地、有目的地、時時刻刻地發動軍事行動〔的自由〕。（同書第 144 頁）

這個結果就是戰爭和佔領領土的事件不時發生，戰爭佔領領土事件不時發生，戰爭和佔領的對象因時空而轉移。

伍德女士的分析特別令人信服，因為它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主要以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不是以直接佔領領土為主的帝國主義的獨特動力。雖然她認為列強之間的軍事對立不會像二十世紀上半葉時候那樣的尖銳，她的論點，還是幫助我們澄清了美國在全球化時代所展現的戰爭主義和軍力主義的一些獨一無二的特徵。

新帝國主義

在伍德女士出版《資本的帝國》差不多同時，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發表了《The New Imperialism》（《新帝國主義》）一書。哈維在這本書中的開始稍為與伍德女士不同，他確認了在帝國主義中起作用的兩個動力：經濟的必要性（其目的是積累資本）和領土的必要性（在提高資本的利潤率的大前提下控制空間）。

哈維正確地指出，這兩個邏輯時常是互相矛盾的。畢竟追求領土的邏輯時所花的成本，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可能會變得“沒有效率”（美國佔領伊拉克的費用急劇上升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他在書中又指出，各帝國主義在行使這兩個動力時是不對等的：有些帝國主義國家偏重經濟的邏輯，有些則偏重領土的邏輯。可是，哈維卻沒有像伍德女士那樣明顯地區分對領土的直接控制和對領土的以市場為基礎

的控制。

他的分析有時似乎轉向到在列寧、盧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析中佔重要位置的領土擴張的觀點。哈維似乎經常只從佔領的角度來思考領土的邏輯，而沒有從推廣資本的市場規則和財產權利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哈維的貢獻中與人最不同的地方，也許是他之重視靠剝奪土地而積累的這個手段。他認為這是新帝國主義的一個中心特色。他向我們提醒，資本主義起源自剝奪農民的土地（這就迫使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他指出，同樣的過程也在今天起作用。

在農民被剝奪土地這個古典型式正在加速進行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農民因此而拋棄農地的生活——，其他型式的剝奪，例如公共資產的私有化和植物、種子等生命型式的專利化，也在加速進行。

所有諸如其類的行動將財產從公共領域拿走，轉給私人擁有。

哈維的分析另一個特點是以下這個觀念：資本主義強國與資本主義強國（包括與像中國那樣的新興國家）之間的緊張和對立已成為新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特色。雖然他認為這些緊張狀態和對立不致於引發帝國主義之間的大戰，他卻清楚地看出，今天的帝國主義被各種衝突弄得一團糟，而這些衝突是因對市場和利潤的競爭而起的。

在這裏，哈維的分析就與帕尼奇（Leo Panich）和金丁（Sam Gindin）近年來在《Socialist Register》（《社會主義文獻記錄》）年報上所詳細闡述的論點相對立了。他們兩人的著作在今天以英文發表的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可以說是構成對帝國主義的第三個有意義的觀點。

帕尼奇——金丁立場的最大強處，很可能是它對缺乏新意地重覆列寧—布哈林帝國主義論的批評，好像它構成了對我們今日所生活的世界的一個合適指針。他們的立場也正確地

堅持，在全球資本和民族國家之間，存在着相互的關係。

除此之外，他們的觀點，也對新帝國主義的特有機體形式加以密切地注意，特別地記述了美國聯邦儲備局之作爲監管這個制度的金融結構、維護美元之霸佔爲世界貨幣的機構的緊要角色。

他們的觀點不太令人信服的地方，依本文作者的看法，是在於他們在事實上拒絕考慮這樣的概念：在強大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中間的對立，決定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的發展方向。帕尼奇和金丁傾向於確認美國，而且只有美國，才是帝國主義國家。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歐洲、加拿大、日本等等，事實上都被看成爲美國的附庸。

歸根究底說來，這個論點非常接近於把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依賴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第三世界是在“依賴”地球北部的情況下存在的——推延到除了美國以外的每一個國家去。可是，在朝向這個方向發展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卻犯依賴理論的同樣的毛病，那就是它不但忽視了第三世界的階級構成和內部的階級鬥爭，而且淡化了在例如巴西這個世界上第十個經濟大國和馬里〔一個非洲窮國〕之間重要的差別。

帕尼奇——金丁的分析也迴避了哈維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和領土邏輯之間的差異。就軍事——領土的意義上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這對世事的發展確有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卻不能接着說，其他的地區資本是在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的範疇之外運作的。

其實，使用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剝削勞工、私佔資源和操縱市場，並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獨有的。許多富裕國家的資本，在其原屬國政府的支持下，追循同樣的積累策略。這些資本真的常常指望美國政府來作爲全球資本的終極保護者。但是，這並不意味，例如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公司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這可從美國與歐洲之間因這兩個航天公司的各自習慣做法不同而引起的貿易爭端來証明。

由於帕尼奇和金丁不注重帝國主義的經濟邏輯和領土邏輯之間的差異，他們就傾向於拒絕考慮其他強權——例如歐洲、日本和加拿大——在與它們的從屬國的關係上，也許會依據帝國的型式而行動的觀念。

以加拿大爲例，目前在地球南部，發生了抗議以加拿大爲基地的礦產公司的大型行動。墨西哥、危地馬拉和許多非洲國家的群眾運動，正朝向這些加拿大跨國公司，抗議它們的侵略性的、新殖民主義的實施。

很難看出爲什麼這些公司（及支撐它們的國家）不應該被定性爲帝國主義。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歐洲、日本的資本在地球南部的行動。可是，有的時候，帕尼奇——金丁的分析卻建議：像加拿大、日本甚至於法國、德國那樣的國家有點反帝國主義的味道（因爲反對美國），認爲它們在美國壓力下仍堅持維護主權。

這個論調似乎滑進了上面所說的依賴理論所犯的毛病：以民族來代替階級作爲今日世界鬥爭的軸心。

更有甚者，這樣的理論也往往會忽視了許多這些國家的特性：內部殖民主義。在加拿大，對原住民的壓迫及對魁北克佔絕大多數說法語的人民的壓迫都是明顯的例子。可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在表面上說是爲了反對帝國主義）也容易滑入保衛以侵佔、壓迫他人爲基礎的國家的權力。

它也往往會貶低了移民、難民和有色人種反對各級政府的種族主義的鬥爭的重要性。用民族國家的等級（以及主要是美國與所有其他大國的對立）等字眼來描述世界列強，因此，就有不着重民族、種族壓迫和國內的階級分歧的危險。

公正地說，帕尼奇和金丁非常明白階級鬥爭的緊要——而《社會主義文獻記錄》有着突顯全球工人運動的驕傲記錄（特別是它的

2001 年刊)。其實，他們正確地建議，內部的鬥爭很可能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期的特徵。但是，雖然帕尼奇和金丁正確強調，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特徵的領土、軍事的對立的減少，他們之反對“對立”的想法，卻把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排出應考慮的問題之外。

因此，他們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描述已經變得過份地單極，而他們的帝國主義論已變成完全以華盛頓為焦點。還有，他們的理論一方面貶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地區、民族衝突，另一方面卻推廣一個左派民族主義的觀點，那就是，反對美國強權的鬥爭已變成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的焦點。

這個理論就對在世界的以下部份活動的社會主義者特別麻煩了：有着高度發展的、從剝削地球南部中得利的資產階級。要克服這些弱點、就需要改編他們的理論，使之重新採納對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分析。

與我們需要理解今天的帝國主義有什麼新鮮的東西一樣——所有這三個理論對這方面都有真正的洞察力——我們也需要闡述界定資本主義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間的競爭和矛盾的新形式。對我來說，歐元之崛起為對美元的世界貨幣角色的一個局部競爭者，似乎在這方面特別有意義。從較長遠看來，中國之崛起為一個有活力的經濟中心也許會大大地重新改變世界權力的佈局——只要它的統治者能夠控制社會的動亂，發展出更精密的金融市場和限制投機性的泡沫的危害。在這些工作中，沒有一樣是容易辦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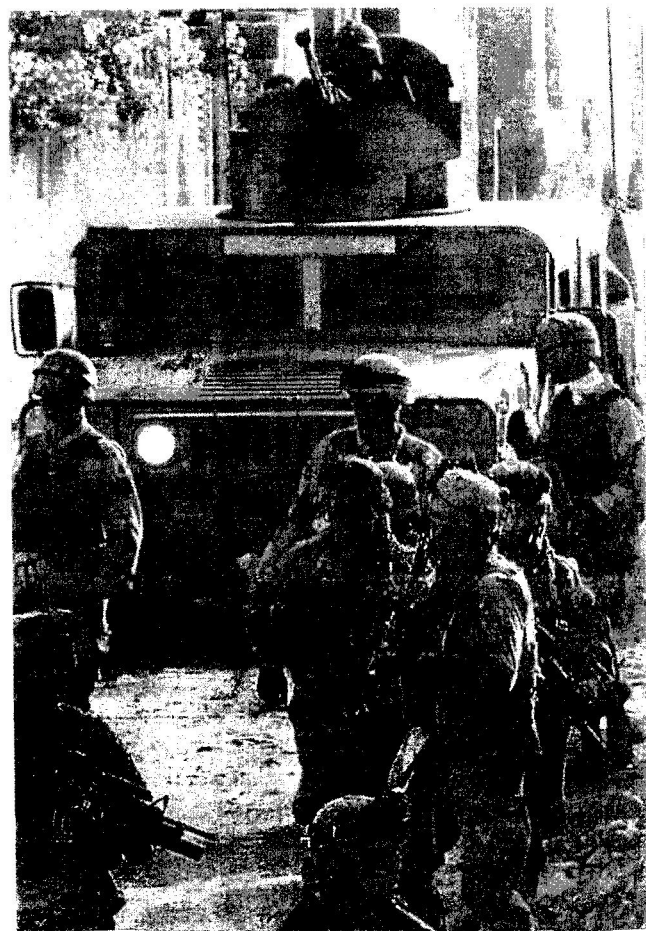
在對今日國際資本主義競爭的新形式提供詳盡的描述方面，伍德之以財產權利和市場力量、不以領土佔領為焦點，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哈維之區別推動帝國活動的兩個邏輯也是。帕尼奇一金丁之依據創造帝國的貨幣和財政體制來對〔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角色作出分析，也對帝國的功能增添更深遠的洞察，雖然它需要對其他貨幣，例如歐元，作出進一步的描述。

毫不驚奇的是，要對新帝國主義作出在理論上比較全面、在政治上比較可活用的敘述，還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當我們向一個我們設法挑戰、最終設法推翻的帝國主義的現實搏鬥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對各個新解釋的強處和弱點，進行清晰的、同志式的爭論。

〔作者簡介〕

大衛·麥克納利 (David Mc Nally) 在多倫多的約克大學教政治學，是新社會主義團體的一位活躍份子，而且是該團體的機關報《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t) 的一位副編輯。他的近作《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這篇文章是基於對新社會主義團體的一次演講而寫的。

〔譯自《逆流前進》雙月刊，2005 年 7/8 月號，第 117 期〕



伊·多伊徹著《流亡的先知》 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 我的意見和更正

王凡西 著 周仁生 譯

【編者按：王凡西這篇《我的意見和更正》和多伊徹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計劃作為中譯本《先知三部曲》的附錄發表。後未採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編者註的方式簡單地指出，現由本刊予以發表。】

約在十年前，我讀了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茨基三部曲》。此書，文體流暢，內容翔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我也在第三卷，即《流亡的先知》中，在談到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及陳獨秀的作用時，發現若干值得更正的地方。我記下這些要點，並打算給作者寫信，告訴他書中的錯誤。然而，由於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使我無法做到這一點，甚至直到這位傑出的傳記作者逝世時，我仍然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

現在，為了希望在《三部曲》的新版中，能改正這些錯誤，我給作者夫人，塔瑪拉·多伊徹寫了以下的意見：

1. 原文第32頁(中譯本第35頁)：“……1928年，他們(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凡西註)召開了中國反對派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某些人主張與毛澤東結盟；那時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不滿，因為在1925-27年之間他的觀點往往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

在這段文字中，有三點不實之處：

一. 中國反對派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1931年召開的，而不是1928年。這次大會的全名是中國托派統一代表大會。1928年召開的是一次代表會議，是“我們的話派”的

代表會議。“我們的話派”是中國托派四個派別中最早成立的一派，稍後不久便統一到同一個組織中了。

二. 根據我的記憶，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份子中，從來沒有人希望同毛澤東結成聯盟。在中國青年托洛茨基主義份子與陳獨秀之間，曾就湘、贛等爆發農民起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27年，當陳獨秀確定地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後一年，他寫了一篇論朱、毛領導「紅軍」問題的文章，而引起這場爭論的。陳獨秀在他的文章中，採取否定態度批判農民起義，並認為起義是毫無前途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青年托洛茨基主義者採取較積極態度，表示在政治上支持農民戰爭，特別強調要保衛武裝起來的農民縱隊，反對國民黨的鎮壓措施。但是，這個立場決不能被解釋為希圖與毛澤東聯盟。

三. 1925-27年間，毛澤東的立場並非與托洛茨基的立場一致。人們可以說，蘇維埃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因為在1927年春天，甚至早在1926年年底，托氏已為中國革命提出了蘇維埃口號，而毛澤東只是在1927年秋天力圖提出同一口號，毛要在蘇維埃口號下發動秋收起義，但遭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反對(見埃德加·斯諾《紅星照亮中國》第一次修訂版、擴大版，第165頁)。但是毛本人從來沒有對托洛茨基的立場，甚至在蘇維埃問題上表示出同情或支持。誠然，共產國際通常對毛是不滿的，但這有另外的原因，特別因為毛過份地保持獨立思

考，這跟他的立場偶而與托洛茨基一致這個事實顯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II. 原文第 32 頁註釋(中譯本 35 頁): “1929 年夏或秋，一個反對派分子林澤從莫斯科返回中國……”。

林澤，實際上是劉仁靜的化名，他於 1929 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島拜訪托洛茨基。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舉行建黨大會，劉仁靜是參加大會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 年當他還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時，他已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1929 年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又幫助伊羅生(Harold Isaacs)收集有關中國問題一書的資料，此書寫成以後，題名為《中國革命悲劇》。1934 年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此後便離開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III. 原文第 423 頁(中譯本第 455-456 頁):

“……在中國，即使他反對斯大林 1925-27 年間的政策曾產生過最強烈的印象，但第四國際在那裡也沒有能當得起‘支部’這個稱號的組織。一些活動於地下、困於極度的貧窮並受到國民黨政府和斯大林主義者圍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員成立了一些小組，在上海有二十幾人，在香港有幾十人，還有分散在中部和東部的少數人，甚至在陳獨秀贊同托洛茨基主義之後，他們也未能擺脫孤立。”

中國托派份子的人數，常有變動，而且變動幅度大。中國的托派份子是在 1928 年開始組織活動的，到了 1952 年就被毛主義者全數撲滅。在這段時期內，托派黨員確實有時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這是在反動統治下最黑暗的時期，即從 1932 或 1933 年起直到 1937 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數較多的時期，例如 1932 年以前及 1945 年之後，這兩個時期的黨員人數上升到遠遠超過“數十個人”。統一大會召開時，中國有

近 400 托派份子(“我們的話派”有 160 人，“無產者社”有 120 人，十月社有 70 人，戰鬥社有 40 人)。這個數字，還沒有把關押在斯大林監牢中備受折磨的大約 200 名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包括在內。1945 年以後，特別是在 1946 年-1949 年這幾年內，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已經分別參加了兩個各自獨立的黨，即國際主義工人黨與中國革命共產黨。最後，在 1952 年，當毛主義者對托派份子進行全國性大逮捕，單就被捕的托派份子來說，大約有 300 人。(實際上被捕的托派份子遠不止 300 人，單以浙江省溫州、杭州、嘉興、金華四縣市的初步估計，已超過 300 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學習班受訓者。——譯者註)

IV. 原文第 423 頁(中譯本第 456 頁):

“……陳獨秀在監獄裡被關押了六年，出獄後，他被放逐到重慶附近一個偏僻的鄉村，被禁止參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生活在恐懼之中，為 1927 年失敗承擔的罪責壓彎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員也不信任他了。毛主義者對他大加指責。他被奸細包圍着，蔣介石的警察又以謀殺威脅着他，於 1934 年把他重又投入監獄，並暗殺了他。”

有關陳獨秀的這段文字，有許多失實之處。第一，陳獨秀不是被放逐到重慶。事實上，1937 年秋天，他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後，首先來到武漢(是出於他的自願的)。武漢是國民黨政府第一個臨時首都，那時武漢是中國主要政治中心。陳在武漢曾兩次發表公開演說，並廣泛地、多方面地與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接觸，特別是同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小黨派人士進行接觸。1938 年秋，當武漢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之前約一個月左右，陳獨秀前往四川省，在重慶附近的一個小城江津定居下來。

其次，陳獨秀再也沒有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或監禁過，也沒有遭受蔣介石特務警察的毒手。相反，他於 1942 年 5 月 27 日，因病死亡。

第三，陳獨秀定居江津時，生活極端艱苦、極端貧窮，並遭受特務份子的包圍、監視，這是完全確實的；但可以肯定地說，他決沒有因對 1927 年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感，使他內心羞慚，終至精神崩潰。陳獨秀對 1925-27 年革命的失敗，願意承擔相應一部份的責任，但斷然拒絕充當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替罪羔羊。自從 1929 年他寫下《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告全黨同志書》以來，陳一貫保持這個立場。諸如自責、遺憾、悔恨等情緒，同陳獨秀的個性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儘管陳獨秀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過激烈的論爭，但他們，尤其是托洛茨基本人，決不會不信任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托洛茨基那樣力盡一切地關心陳獨秀的命運。）他們之間的爭論無非是有關基本問題以及策略問題。爭論的內容，回頭我還要談到。

V. 原文第 423 頁（中譯本第 456 頁）：

“1938-1939 年，托洛茨基進行了一次徒勞的嘗試，想把他從中國救出來，指望‘他能在第四國際起到與片山潛在第三國際同樣的作用……能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大利益。’但陳獨秀認輸了，陷入了極端的悲觀主義。”

爲了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托洛茨基寫信，力圖說服陳獨秀離開中國，以及陳對這幾封信的答覆究竟說了些什麼，我不妨對當時發生在兩人間通訊往來的國內外形勢，簡單地說幾句話。1938 年，正是莫斯科製造最後一次審判案的一年。那年 3 月 2-15 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老布爾什維克被帶上法庭受審，並被處決。早在一個月前，即 2 月 16

日，托洛茨基的兒子，里昂·西道夫已被斯大林派遣的格柏烏殺害了。作爲國際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部份，直接由斯大林派往中國的頭號代理人王明，於同年 3 月 15 日，在武漢發動一場反對陳獨秀的誹謗運動。他們無恥地指控陳是爲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的間諜，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 300 元津貼。托洛茨基在這方面是有高度警覺性的。早在 1937 年，即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心中早已存在着如何保護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免遭斯大林分子迫害的問題。他並不確切地知道中共將如何羅織罪名，企圖陷害陳獨秀，但他根據自己的認識，自己的經驗，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如何對付反對派的辦法的。因此他堅信，斯大林定會通過他在中國的代理人，採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迫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特別是陳獨秀本人。他甚至考慮到，中國斯大林分子有可能採取暗殺的手段。這就是托洛茨基力圖要陳離開中國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陳能在第四國際中起到片山潛在第三國際中所起的同樣作用，這也是真實可信的。但這顯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托洛茨基寫給上海一個托派份子的兩封信（日期是 1938 年 2 月 5 日和 6 月 25 日），是由專門信使帶到四川的。陳在收到這兩封信時便作了答覆，也許爲了安全，也或許因爲信不是直接寄給他的，他的答覆不是以信的形式，而是以論文或聲明的形式發出的。註明的日期爲 1938 年 11 月 3 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正是從這“長篇論文”中，引證陳獨秀的觀點，作者把這觀點描述爲“極端的悲觀主義”。實際上，陳在他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決不能認爲是悲觀主義的，如果我們再深入到那個時期，他的基本論點，那就更不是悲觀主義了。如我們所知，1935 年左右，當他仍在國民黨獄中時，

深受莫斯科審判案以及蘇聯官僚層不斷蛻化墮落的影響下，陳獨秀開始重新考慮布爾什維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立場。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把新的看法應用到民主概念上，他堅持認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決不應在民主帝國主義國家中採取革命失敗主義立場。最後，於1940年12月，他在稱為《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寫下他的觀點，現在我從他的十五點意見中譯出如下四點：

“（8）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各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9）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劑，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

“（10）此次世界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的集團互爭全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為民主自由而戰”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

“（11）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家方面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裡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取得勝利……。”

顯然，陳獨秀此時關於民主和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已經遠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難怪所有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群起而反對之。但這決非意味着他的精神正在崩潰下去。直到臨終，他還始終為他的新觀點作頑強的鬥爭，在他生命結束之前僅僅只有十四天了，他還寫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VI. 原文第 423-424 頁（中譯本第 456-457 頁）“然而他仍不時地分析中國形勢，十分透徹地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在什麼地方和為什麼受挫。在第四國際宣佈成立兩個月後所寫的一份聲明裡，他直截了當地解釋說，為什麼要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與他本人所認為的那樣）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壞了中國一些最先進地區的工業；因而，‘中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物質上與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 30 — 40 年前的條件下’。因此，將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今天不理解將來的政治形勢會向何處發展，不承認中國無產階級十分弱小以及其政黨所處的地位，那麼我們就等於是坐井觀天，由於自滿自大而痛失良機’。他繼續寫道，托洛茨基派成員常因其宗派傲慢，對毛主義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以及無視抗日戰爭的需要，使自己脫離了現實政治生活。他擔心，第四國際的建立只會加強他們的‘傲慢與孤立’，而這場冒險將以破產告終。”

這段文字引證了陳獨秀與中國其他托派份子的爭論，並且加以闡述，現在我要說的有三點意見：

一．“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

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陳獨秀在這段時期內已把這一事實，反覆強調多次，但從這一前提出發，陳獨秀並沒有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運動必須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托洛茨基和他本人所期望的）依靠城市工人。” 陳獨秀從未懷疑或曾動搖過這樣的立場：即爲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話，那就是過份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性（強調到把真理變成了荒謬），當他把無產階級領導這個概念應用到國際範圍內時，竟把各主要的大國比作無產階級，而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作農民，他說：“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戰爭，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會得到勝利。”（見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中的第十五點）。因此，陳獨秀並沒有認爲，中國農民能取代中國工人階級，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當他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的現實力量及其政黨的情況時”，陳獨秀僅僅把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把陳看作是悲觀主義的，因爲他不相信，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之前，中國社會革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二. 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悲觀主義的。儘管他還有上述觀點，但他並不採取觀望態度，他也沒有躺下來，拋離一切希望。依他之見，中國革命者，包括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內，在他所設想的條件下，應當先盡一切力量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積極參加抗戰，拿起武器，依靠農民，並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一方面反對國民黨，另一方面反對中國共產黨。只要通過這樣的努力，他堅信，如果社會革命能在一個或多個帝國主義國家裡爆發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在即將來到的中國

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並把革命領導到勝利。（在此，我必須提到一件事，即 1937 年冬天，陳在武漢時，曾試圖在反國民黨的軍隊中工作，但這個試圖沒有取得成功）。

正是根據這一積極而又有悲觀主義色彩的立場（這一立場是否正確或錯誤，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陳在寫給托洛茨基的那份聲明中，他才責備中國托派份子爲“宗派主義的妄自尊大，清一色地以否定態度對待毛主義，而對於抗日戰爭的必要性，卻缺乏敏感性”。也正是從這個立場出發，他才認爲中國托派份子要對“脫離政治現實”負責。

三. 就我的記憶所及，陳獨秀在聲明中，抨擊中國托派份子的“自滿情緒和虛幻的錯覺”，並不是同第四國際的宣言聯繫起來的，他從未說過“這種冒險行爲只能以破產告終”。然而在這一點上，我自己也並無把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對照 1938 年 11 月 3 日所寫的聲明原文加以核對，而此時這份聲明還保存在“密封的檔案”裡。

VII. 原文第 424 頁（中譯本第 457 頁）：“他本人傾向於時而同國民黨，時而同毛主義妥協，但既不能也不願同前者或後者結盟。在餘下的悲劇性的歲月裡，他一直是個垮掉了的人。”

考慮到陳獨秀在民主立場上的改變，人們很可能設想他或者定將與國民黨的舊式民主主義妥協，或者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妥協。但是，作爲陳獨秀的朋友之一，作爲他晚年思想轉變的反對者，我應當說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者，他支持由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但他從未對國民黨及其政權產生過任何幻想，因爲他認定國民黨已經腐朽透頂，決不可能領導這次戰爭到最後勝利。自從他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後，國民黨領導人

對他軟硬兼施：一方面使他處於受長期的監視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設法想把他收買過去。就我所知，至少有兩次這樣的時候，試圖誘使他下水。國民黨通過陳的老朋友（此時，這些老朋友已在國民黨政權中擔任要職），向他提供大量金錢（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慶）。但兩次，陳獨秀都斷然拒絕了。正因此，陳獨秀一直在極端貧困中渡過他的餘生。當他去世時，他的身後喪事是由當地鄉紳爲他辦理的，而他的遺孀後來是由他以前的學生贍養的。

至於同中共的關係，確實存在過這樣的試圖：即 1937 年秋天，毛主義者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有過謀求和解的事實。但是，這個試圖是由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羅漢的倡議下提出的，而陳獨秀本人及中國托派組織並不知曉。羅漢是老共產黨員，同中共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是老朋友，他見到了葉劍英，那時葉是八路軍駐南京代表，他們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在抗日戰爭中合作的可能性。葉劍英同意了羅漢的合作建議，並敦促他去西安。他在西安與西安八路軍代表林伯渠共同就這個建議討論了幾天。然後經由林伯渠，羅漢與毛澤東交換了幾封電報。毛的回答是：他表示歡迎陳獨秀回到黨內來，但條件是陳要公開譴責托洛茨基主義，聲明他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並承認加入托派行列是錯誤的。當陳獨秀得悉羅漢的意圖以及毛澤東的答覆時，他非常氣憤，這不但因爲毛的條件是荒謬的，而且因爲羅漢試圖與中共達成妥協，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此後幾個月內，王明便在武漢發動一場反陳獨秀的惡毒誹謗的運動。從那時以後，陳獨秀不可能有，也確實沒有任何餘地去幻想同毛主義者達成協議了。

自從國民黨（表面上聲稱是他的“朋

友”）和毛主義者（是他的公開敵對者）一貫以來是用污泥濁水潑在陳獨秀的身上的。我希望，《流亡的先知》——經作者認真考慮後而撰寫的著作——應當把有關陳獨秀一生的幾處錯誤論述，最後能夠糾正過來。不管陳獨秀在他生命的餘年所懷有的思想觀點是對或是錯，陳獨秀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反抗者，或一個對所有既定的權威的終身反對派（這是後來胡適博士稱呼他，而且陳本人也是樂意接受的）。

誠然，陳獨秀以悲劇性人物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但是把他描述爲一個“心灰意冷”或“精神崩潰”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

1975 年 9 月 15 日

附：塔瑪拉·多伊徹的覆信

1975 年 10 月 29 日於倫敦

親愛的王先生：

十分感謝你能詳細地對《流亡的先知》一書提出你的看法。其中一些錯誤的改正，很快就會在新版書中見到。另外一些意見，我得到要用更多時間，並且盡可能地予以研究。但你提供的所有意見，都是十分可貴的，無疑地，我定將一一記下來，只要我的工作負擔稍有減輕的話，我會在一二個星期內將它們處理好。

致最好的祝願和由衷的問候！

你的忠誠者塔瑪拉·多伊徹

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

林 東

一、抗日戰爭隨校內遷

我們是山東省立濟南第一中學的學生，年齡大者十六、七歲，小者十二、三歲。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但學校仍進行招生考試。九月照常開學上課。十月，日軍佔領平津，逼近濟南，並瘋狂轟炸洛口鐵橋和市區，學校決定遷至泰安，借住省立第三中學，繼續上課。校長孫東生提議“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鼓舞並穩定了我們的學習情緒。當時全校師生多認為戰爭和遷校是暫時的，沒有想到它的長期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機又狂炸泰安並低空掃射，市民傷亡甚多。濟中師生乃再內遷，經金鄉、許昌至南陽的賒旗鎮（今河南社旗縣）。同時，山東各地的中學也陸續遷來，組成“山東聯合中學”。濟中在山陝會館和文廟繼續上課。當時還說要“保衛大武漢”，高唱“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抗日情緒高漲，同學們紛紛參加排戲、歌咏、宣傳抗日，動員群眾，起來保家衛國。

一九三八年五月，鄭州告急，山東聯合中學師生二千餘人，第三次遷校至湖北鄖陽，並改為“國立湖北中學”。此行十多天，步行八百里。自背行李、跋山涉水，頗為艱苦。老弱師生及女同學改走漢江水路，船在老河口翻沉，三十四人落水，二十九人溺死。慘案發生，全體師生震驚！到鄖陽後，住馬王廟，繼續上

課。鄖陽是一山城，濱臨漢江北岸，波濤洶湧，地勢險峻。時值盛夏，天熱、多雨、潮濕、患瘧疾、疥瘡者多、同學和老師病死多人。山城閉塞落後，群眾對抗日戰爭知道甚少，我們用各種形式進行宣傳。我們在遷校和流亡生活中，深深受到了課堂之外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逼近武漢，國民政府撤離武漢，進駐四川重慶。冬，學校又作第四次遷校，目的地是四川。此行二個月，步行二千五百里，孫校長率原濟中師生二百餘人先行，於十二月一日黎明渡過漢江，雨雪中南行五十里，在山上小鎮宿營（今湖北十堰市附近）。次日進行分隊，在老師帶領下，仍然是自背行李，沿漢江西行。江中多險灘，水流湍急、兩岸崇山峻嶺。村鎮少、行人稀。夜宿古廟睡禾草地、吃玉米地瓜粥、沒有鹽巴。走出峽谷，進入陝南盆地。一九三九年元旦，到達漢中、休整數日換衣服，捉虱子、治疥瘡。漢中有西北工學院和後方醫院，重又聽到了抗戰的信息。正是三九寒天，元月初再沿川、陝公路南行，這裡是三國時的古戰場，西城、定軍山、陽平關。爬上大巴山脉的險隘五丁關，進入嘉陵江上游的廣元，再爬上劍門到劍閣縣。入川之難，到了“天上”方才知曉。我們時而走在群山中盤桓的公路上，時而改走深山峭壁中的古棧道。滿懷激情，艱苦而豪邁，真也高歌笑談山水間，揮汗跋涉風雪中。

歷時一年多，徒步經走了魯豫鄂陝川五省，行程七千里，山東聯合中學師生二千餘人，終於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三月間，陸續到達了四川北部的綿陽地區。定名國立第六中學。校本部（高中）設在綿陽、一分校（師範）設在梓潼，二、三、四分校初中分別設在新店子，德陽、羅江。羅江四分校以原濟南一中師生主體。

二、真理讀書會

四川國立六中真理讀書會，是抗日戰爭時期，學校內遷時組織和發展起來的。濟中在泰安初始不過五、六人，鄖陽湖北中學時十多人，到了四川國立六中時，發展五十多人。會員分佈在羅江四分校、綿陽高中部、梓潼師範部等地。讀書會曾有過的存書，如今能記起的，見後面書目。

進步書籍是我們的精神食糧。書是由個人購買，集體使用，專人保管。分班分組閱讀，讀後寫心得體會相互傳閱。小組討論會在校內，大組會在城外山上廟裏。小組實為“小公社”：金錢互濟，患難互助。因為那時我們都是流亡在外，無家庭接濟。讀書會沒有明確的章程，入會也沒有任何儀式。它的內聚力來自進步的書籍，是馬恩列托的書和陳獨秀的書，把會員們團結起來的。

書籍的保存和流通，是讀書會裡的大事情。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羅江四分校最為開明，進步書籍可以半公開閱讀，牆報和討論會也可公開進行。但是在綿陽校本部和其他分校就管教甚嚴。一九四零年冬天到一九四一年初，在皖南事變前後，綿陽校本部來了“白

色恐怖”。進步師生被捕和被迫離校，校內實行軍訓。書籍的存放和流通改為在“地下”進行。讀書會員傅國良在校本部被捕，那裡的存書連夜送到羅江四分校。一九四〇年春，羅江會員被調到梓潼一分校，存書分散帶走。梓潼分校校方檢查甚嚴，隨把部份存書放在西山上廟內和石墓室內，秋天多雨，發現漏雨，又搬到城東山上的塔頂。這批書大部份被會員先後帶到重慶和成都。一九四四年春，最後一批書由曹毓林熊安東也帶到重慶。

閻子桂老師是讀書會的輔導員。他是山東人，在北大讀書時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五年參加的“一二九”運動，曾去南京請願，要求蔣介石抗日。一九三七年在山東省立濟南第一初級中學教書。當時，他教“公民課”，但不用課本，在課堂上談抗日戰爭形勢，批判抗戰必敗論，駁斥抗戰速勝論，反對唯武器論等等。提出長期抗戰爭取勝利的條件：大力發動群眾，全民動員；改善士兵生活待遇，實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立即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日戰爭等等（見趙芳舉《緬懷孟憲章同志》），使同學們大開眼界，心胸開朗。

一九三八年秋冬，學校在湖北鄖陽，我們看到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遷都重慶；同時，校方苛扣教職員薪金，貪污學生伙食費，由此引發學生不滿。校內牆報批評譚（時有讀書會牆報《星火》以及其他進步牆報多種）。閻老師在公民課上大講時事，批評各式不利抗戰的思想和言論，引起頑固派的極為不滿。某日傍晚，有十數人闖進教職員宿舍，呼喊閻子桂回

答問題。一時聚集了許多同學，讀書會員尹純德、范文華、康至泉等也趕到，情況緊張，進步的和頑固的兩派同學有動武之勢。當時國文老師李廣田和音樂老師瞿亞先各舉馬蹄燈照明，歷史老師許衍梁在後，閻老師居中，他鎮定地回答了來人提示的每一個問題，態度和平，說理簡明。提問者感到無言以對，竟自撤離了之。來勢汹汹的“興師問罪”，倒成了一堂形勢大課。（往事久遠，問答情節已難記清，但屬於抗戰形勢）。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閻老師在羅江四分校仍上“公民課”，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國際形勢。這次世界大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

家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不義之戰：講《僱傭勞動與資本》，揭露資本積累的秘密：資本家無償地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以及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是勞動者創造了大老板的財富，講《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發展中前進，新社會將取代舊社會。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真理總會戰勝謬誤。同學們聽得真切，課堂十分肅靜。

他在城外的山上給讀書會員講《不斷革命論》，講蘇聯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近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展示出：民主民族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同時一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為世界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是世界工人和勞動者的共同事業。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事業，只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將不斷地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全世界取得

勝利。

這位讀書會的啓蒙老師，對讀書會員產生了深刻影響。往後我們還要談到他。一九四零年夏天他離開羅江四分校去重慶。

三、讀書會的書目和會員名單

往事久遠，記得的書目如下：

馬恩著作：《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自然辯證法》、《從空想到科學社會主義》、《家庭、國家及私有制的起源》、《反杜林論》、《僱傭勞動與資本》、《費爾巴哈論》。

普列漢諾夫著作：《藝術與社會生活》、《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列寧著作：《帝國主義論》、《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列寧選集》（多卷本）、《國家與革命》、《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遠方來信》、《四月提綱》。

托洛茨基著作：《自傳》（上下卷）、《不斷革命論》、《被背叛的革命》、《史太林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文學與革命》、《論德蘇協定》、《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兒子、朋友、戰士》、《中國革命問題》。

陳獨秀著作：《實庵自傳》、《長期抗戰的條件》。

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

鄭學稼著作：《俄國黨爭文獻》、《俄國黨獄真相》。

紀德著作：《從蘇聯歸來》、《爲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

克魯普斯卡亞著作：《回憶列寧》。

約翰·雷特著作：《震撼世界的十日》（十月革命紀實）。

高一涵著作：《鮑羅庭的罪惡》（揭露中國大革命時俄國顧問執行斯大林右傾機會主義的言行及後果）。

柳寧著作：《風暴》（中國左傾盲動主義的揭露和批判）。

嚴靈峰著作：《中國社會性質論戰》。

王實味著作：《野百合花》。

艾思奇著作：《大眾哲學》。

張中甫著作：《中國近代史》。

日本佐野加沙美著作：《中國歷史教程》。

劉鏡園譯：《克魯泡特金自傳》。

高爾基著作：《母親》、《回憶列寧》等。

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介紹俄國革命和國內戰爭》。

肖洛霍夫著：《被開墾的處女地》。

夏衍著：《包身工》（揭露上海工人的苦難生活）。

會員名單、約五十餘人、往事久遠，難記全。

綿陽國立六中高中部：

孫鴻志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江北軍工二十一廠鍛工，後又回學校，一九四九年在重慶。

楊承章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一九四九年去西安。

傅國良 一九四零年在綿陽六中被捕，後

押至成都，一九四九年去重慶。

郭桓參 一九四零年去成都，一九四九年在成

都教書。

羅江國立六中四分校初中部：

一級

孟憲章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二十一廠鍛工，歌樂山汽車修理廠工人，樂山武漢大學校辦工廠工人，一九四九年在樂山，後去西昌，二零零零年病逝。

楊壽源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二十一廠技校學徒工，一九四一年被捕，後釋放，一九四九年考入山東大學，一九四九年在上海，一九六二年病逝於上海監獄。

尹純德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稅務局職員，一九四五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張聖時 一九三九年去重慶，一九四四年考入重慶中央大學（南大），一九四九年在南京。

劉志超 一九四零年重慶南方印刷廠排字工人，一九四五年文事出版社工人，一九四九年去重慶，後去西昌。

蘇學常 一九四零年重慶南岸織布廠工人，一九四一年貴州遵義教書，一九四四年回重慶，一九四六年回上海，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牟家義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一九四四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王元勳 一九四二年去成都，一九四六年去成都醫院養肺病，一九四九年在成都。

牟敦傑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

陳汝霖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一九四九年在北平。

二級（六中四分校）：

范文華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一九四一年在貴州遵義教書，一九四四年回重慶，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一九四九年在青島，後去濟南，六十年代得瘋病，病逝。

康至全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工廠學徒工，一九四九年在四川。

趙勝文 一九四零年重慶郭家屯五十兵工當勤雜工。

劉廣恩 一九四零年重慶磁器口軍工製呢廠技術工人。

曹慶華 一九四零年重慶公共汽車公司售票員，一九四一年被捕入獄。

李雨亭 一九四一年去重慶，一九四六年在成都教書。一九四九年在重慶，二零零三年病逝。

李廣智 一九四一年去重慶，流落街頭，死於霍亂病。

王學誠 一九四一年去重慶，流落街頭，死於霍亂病。

隗寬 一九四二年去重慶，當南岸牛角沱紗廠磨房工人，一九四九年在重慶，他是濟南大明湖船工的兒子。

趙鳳田 一九四二年在重慶飛機場做雜工，同年被捕入獄，一九四五年釋放，一九四九年又被捕，同年在重慶渣滓洞被殺害。

單松岑 一九四一年重慶江北鐵工廠鍛冶工人，一九四五年死於急性肺炎。

王春錄 一九四一年去重慶，一九四九年在重慶。

楊承志 一九四三年考入成都四川大

學，一九四九年在山東濟南中學教書。

三級（羅江六中四分校）

任玉璽 一九四零年去重慶，一九四一年被捕，後釋於出獄，一九四七年民生輪船公司職員。

王香臣 一九四一年重慶二十一廠制圖員，同年到遵義教書，一九四五年考入重慶鄉村教育學院，一九四九年在重慶。

張洪仁 一九四一年重慶二十一廠制圖員，同年被捕，後釋放出獄，一九四五年考取東北大學，一九四九年在北平。

杜文林 一九四一年去重慶，一九四五年考入復旦大學，一九四九年在上海，一九五零年去東北。

曹毓林 一九四四年去重慶，一九四五年考入浙江大學，一九四九年在杭州。

熊安東 一九四四年去重慶，一九四五年考入中央大學（南大），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刁長堯 一九四四年去重慶，中華書局文書，一九四六年死於肺結核病。

李安民 一九四四年四川三台稅務局職員。

姜桂林 一九四四年在陝西雙石堡醫院工作。

劉錫佑 一九四四年在成都教小學。

四級（羅江六中四分校）

張宗武 一九四二年羅江六中四分校撤消後，不知去何處。

牟杰 一九四二年羅江六中四分校撤消後，不知去何處。

四、在戰爭年代認識社會

我們是一九二五年出生的一代青年學生。童年會唱“打倒列強！除軍閥！”，讀小學時知道五卅慘案：日軍殺害濟南市民五千餘人，蔡公時外交官被殺害。一九三一年日軍強占東北三省，一九三六年日軍進攻華北，喜峰口和百靈廟戰役震動了我們小小的心靈。一九三七年蘆溝橋抗日戰爭爆發，緊跟着是七千里四次隨校大遷移。

同時親眼看到日軍狂炸濟南、泰安和兗州，破壞家園和慘害同胞的血淚罪行，從而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慘酷性和反動性。抗戰初期，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希望；南京失守，武漢撤退和遷都重慶，逐漸認清它在消極抗戰，偏安自保。汪派投降日寇、蔣派乞求英美。歷史和抗戰都証明中國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不徹底性，大革命時期它鎮壓過農民土地鬥爭，此時它也是無能完成反帝抗日的民族解放任務。

南陽除旗鎮（今社旗縣）是河南四大鎮之一。鎮內有七十二條街——各行各業的手工作坊分街生產和經營，明清時代商業資本已有驚人的發展。可惜當時已是蕭條破落，生機全無了。但鎮中尚存紅牆綠瓦廟院式的“山陝會館”，代表資本的原始積累相當集中。中國歷史走自己的路，從秦漢以來，長期陷入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改朝換代的怪圈中。

我們走過了伏牛山區、漢江兩岸、陝南和川北，農村普遍貧困，經濟凋殘，苛捐雜稅和地租盤剝。農民食不飽腹、衣不暖身。漢江兩岸的山頭上屹立着農民起義留下的寨牆。山林內仍有“紅”和“黃”帶子會在活動。中國

的土地問題極待解決。“耕者有其田”空喊十多年，國民黨政府是無法解決的。

漢江險灘白水河，河岸修建觀音堂，堂內香火不斷，堂外江中沉船的桅杆仍在風雨中搖動。山城洵陽縣十分貧苦，却建造十八層地獄的城隍廟。漢陽縣城外，冷森森地豎立着幾十座節孝坊。羅江縣紳士們照舊在文廟祭孔，殺豬宰羊。“五、四”時代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在那裡？封建迷信還在控制着人們的頭腦！

梓潼縣的“保護神”叫文昌帝君，它平時駐在七曲山上的“文昌閣”，春天請回城內的“文昌宮”。迎神時節，全縣鄉紳、善男信女、人山人海。文昌坐八抬紅大轎如帝王出巡。旗牌招展、烟火瀾漫、鑼鼓開道、銅炮齊鳴！更有數十男女，全身掛滿油燈隨行。進得城來，沿街商店設案祭典，上香跪拜。真“天府”奇觀！平時城裡却常見到官兵拉壯丁，農民像囚犯一樣押解上前綫了。當時就是這樣：富人們在後方發國難財，照舊過那原封不動的腐敗生活，窮苦人却被拉到前方殺敵抗日。那能不失敗嗎？

抗日戰爭在艱難地進行着的同時，國際局勢也在激烈衝突中走向戰爭。帝國主義兩大陣營（英美法和德意日）爲了各自的利益正在加緊備戰。蘇聯却忙於“清黨”和“肅軍”（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九月希特勒進攻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回師東進，德蘇戰爭開始了。同年十二月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不久，太平洋戰爭也爆發了。國際局勢激劇地變化着，戰爭從大西洋

燃燒到太平洋，亞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們均陷入戰爭的苦難之中。

全世界正處在多事之秋，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叫囂並發動戰爭。同時十月革命誕生的“社會主義”蘇聯又發生了黨爭、黨獄和肅軍，列寧生前的老戰友、保衛共和國的元帥以及將軍們被斯大林強加以“間諜”和“叛徒”的罪名鎮壓了，數以萬計的革命幹部和戰士也被關押在集中營。德蘇戰爭之初，蘇聯前綫接連失敗，紅軍戰死、被俘以及大面積國土淪喪，會員們當時都感到悲痛和憤恨，都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讀書會會員們經過學習馬恩列托，總結親身見聞，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走“十月革命”道路。走列寧托洛茨基領導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和世界革命的道路。我們不相信“一國社會主義”論，也不迷信“救世主”，但相信共產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要到城市去，組織產業工人和勞動市民，實現《長期抗戰的條件》，閱讀《母親》和《包身工》、認識工人運動的方方面面。

五、真理讀書會的主要活動

一九三九年初，羅江六中四分校開學上課。校長開明，老師思想進步，學生求知的熱情高漲。在李廣田老師的編導下，師生集體創作了《七千里征途》（即《在風沙中挺進》）。該書詳細記錄了從濟南遷校至四川羅江的生活和見聞。作家陳翔鶴作序，孫東生校長作代序並準備出版。書約十多萬字、三十篇，十七位作者中，有真理讀書會員尹純德、張聖時、蘇學常等人。作者們暢所欲言，對沿途的社會

醜惡現象口誅筆伐，頗多新鮮見解。可惜，當時重慶、成都和昆明等地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終未見出版。另外瞿亞先老師領導的“狂飆劇團”，從鄖陽到羅江跋山涉水二千五百里，沿途演出，宣傳抗日，動員群眾，頗受各界歡迎。小演員中有讀書會員張洪仁等人。

一九三九年春，讀書會員范文華、孟憲章等人聯合校方進步同學，共同與校方談判，爭取建立了學生自治會，范文華為主席。隨之新建餐廳（草棚式），改善學生生活。出版牆報，增加閱覽室書刊。讀書會的牆報《思潮》，刊頭木刻畫由張聖時作，新穎醒目。當時的評論重點是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同時各班級的進步同學自組織出版了多種牆報。校園內思想活躍、開放民主，有“北大之風”。

一九四零年，綿陽六中高中部也有讀書會的牆報《黑白》及其他進步牆報，但沒有學生自治會。當時牆報上也提出改善學生生活，並質疑校方苛扣制服費用。校方不滿，借口一座茅草房火燒，制造了“有人破壞”！隨後綿陽公安局逮捕《黑白》牆報負責人傅國良以及其他進步的同學。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綿陽高中部發生多次逮捕事件。同學和老師許衍梁等二十多人失蹤或入獄。傅國良以後被押解到成都監獄，雙腿癱瘓。他的母親從濟南趕到成都，陪他精心療養多年，始得康復，出獄後留在成都。

一九四零年夏，綿陽校本部頑固派對羅江四分校進步師生施加壓力，孫東生校長被調往重慶“受訓”不歸。當時有畢業生將遷入高中部，頑固派却廢除了分校畢業生昇高中免考

制，并下令嚴格入學考試，借此“篩選”他們認為合格的學生，把進步學生拒之校外。學生自治會隨之罷課，並前往綿陽請願。經過艱難的談判，校方只免除了考試，但要調到梓潼師範部另設立高中部。梓潼分校以嚴格出名，很多同學因此離校。讀書會和進步同學共同領導了這次罷課運動。

同年秋，六中同學又有幾人被捕，四分校校園的環境漸漸惡化了。閻老師和進步老師先後離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新四軍和人民群眾，“白色恐怖”來了。一九四二年春，四分校終因“赤化”而被重慶政府撤銷，師生併入其他分校。當時，進步同學多數被迫去了農村，真理讀書會員走向重慶和成都。

讀書會員走向工廠，走向工人

一九三九年春，山東梁貽由武漢經西安進川，他自背行李步行，有時幫人拉板車和趕馬車，沿川陝公路爬過秦嶺和大巴山，四月間到達了羅江。他和閻子桂商定：真理讀書會員要去工廠鍛煉一事（詳見《回顧一九一八—一九四八》波臣著）。同年五月，他在“五·三”大轟炸時到了重慶，並籌劃會員進廠事。他先進軍政部制呢廠，後又去兵工五十廠。

真理讀書會員學習馬恩列托理論，接受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抗日戰爭的不斷革命論觀點，產生了要到工廠去，到工人中去的念頭。要到工廠中當工人，組織工人運動，求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願望如饑如渴，不可耐待，於是從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二年秋，分批分組按不同路途先後去了重慶。

一九三九年秋，第一批去重慶的有孫鴻志、孟憲章、楊壽元等。他們都是最早參加讀書會的同學。多數進廠做學徒工。後來孫鴻志因難以適應車間鍛工生活又回到了學校，其他人堅持下來。

一九四零年夏天，綿陽高中部傅國良被捕後不久，第二批會員去重慶。他們是范文華、康至全、任玉璽、蘇學常、劉志超等十數人，多數進工廠當工人，而且都堅持下來了。閻老師也在此時去重慶工作。

一九四一年春天，太平洋戰爭爆發，汪精衛投降，重慶政府內外交困。當時六中校園又來了“白色恐怖”。真理讀書會梓潼南山廟內開大會，並決定第三批會員去重慶，他們是李雨亭、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等十數人。多數進工廠當工人，都堅持下來。

當時因日軍飛機經常轟炸重慶市區，影響工廠生產，各工廠招工者不多，進廠甚難。李廣智和王學誠兩位會員因沒有及時找到工作，流落街頭，趕上霍亂流行，因食用攤販的飯菜，染上霍亂，二人先後病死。接受這次慘痛的教訓，後來改為小批人員再去重慶。

一九四二年去重慶的有隗寬、趙鳳田等人。

一九四四年去重慶的有曹毓林、熊安東、刁長堯等人。

去成都的有郭桓參、王元勳、楊承志、劉錫佑等人。

六 戰時的陪都——重慶(上)

山城重慶，一九三八至四五年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遷都至此。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之交

會口，當時人口 300 多萬，市內工廠、機關和學校多從“下江”各城遷入。工業有煤鐵礦、兵工廠、紡織廠等。技術工人來自上海、青島、廣州、鄭州和武漢等地，隨廠遷來。青年工人就地培養者多，各廠多分佈兩江沿岸的灘頭和山溝里，很不集中。原材料和成品進出以及人員往來均靠水運，很不方便，機械設備和工藝流程都是老式的，帶有落後的手工操作。重慶產業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政治地位低、社會活動少。在廠裏埋頭生產，回家忙於生活，熟練工人的工資較高，但要養老育幼，青年工人多來自市民和中小學生，他們思想開放，要求進步。當時抗戰失利、官吏貪污腐敗。物價高漲，生活困難。青年工人普遍對現實不滿，同時看不清前途在何方？勝利在何時？產業工人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組織和動員產業工人，是我們去重慶的目的，同時也是我們鍛煉和學習的機會。

一九三九至四四年，綿陽六中真理讀書會的同學，前後分五批去重慶。主要是進工廠，再是文化機關和學校，當時分佈情況如下：

大渡口重慶鋼鐵公司第三廠(煉鋼)：任玉靈等十餘人做學徒工。簸箕石重慶兵工二十一廠(制槍)：孫鴻智、孟憲章做鍛工，王香臣、張洪仁做制圖工。該廠技術學校有楊壽元等做學員。郭家沱重慶兵工五十廠(制炮)：梁貽做電工、趙盛文做勤雜工。磁器口軍政部制呢廠：劉廣恩和劉恆新做機工。南岸重慶織布廠：蘇學常，職工。江北制鐵廠：單松齡，鍛工。重慶公共汽車公司：曹慶華，售票員。牛角沱碾米廠：隗寬，磨工。南川飛機修理廠：

趙鳳田(金聲)，勤雜工。南方印書廠：劉志超，後去文聿印刷廠。中華書局：刁長堯，文書。重慶稅務局：尹純德，職員。校場口工人福利社：熊安東，職員。

另外在民生造船廠、南岸酒精廠、歌樂山汽車修理廠以及青本關中學也有讀書會員。曾家岩重慶電力公司，下設三個發電廠和電工訓練班，該公司有工人師傅劉振基(電工)以及工人劉毅和王坤榮等。

當時在重慶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老人”(我們稱呼“山東老梁”和“東北老王”等。)，有以下幾人：

梁貽：又名波臣、山東曲阜師範畢業。一九三八年在武漢紗廠做工，後經西安、羅江到重慶。先後在金陵大學電訓班，兵工二十一廠，兵工五十廠做電工。是綿陽六中真理讀書會在重慶的組織者。

閻子桂：真理讀書會的啓蒙老師，一九四〇年到重慶，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張維良：上海店員工人，一九四〇年到重慶，先後在南方書店、文聿出版社工作，經濟支援並介紹會員進廠。

史逸民：中央(南京)大學畢業，一九三九年到重慶，先後在《益世報》、大川針廠和一家私人銀行工作。經濟支援，介紹工作。

趙芳舉：山東徐文昇，濟南鄉村建設專科學校畢業。一九四〇年重慶電力公司職員，參加重慶《工人呼聲》的編輯和排印工作。

王振華：東北王叔本，北大學生，一九四一年初由廣西到重慶，先在《益世報》當校對，後在華岩高級農校教書。《工人呼聲》主編。

《工人呼聲》在一九四〇年冬天出版。油印、不定期、署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重慶小組，(後改為四川地委會)。梁貽、張維良、趙芳舉和工人劉振基分工負責。在重慶工廠區散發。四一年春由王振華主編。出版地址在校場口陳家館一間閣樓，〈注〉內部叫“白屋”。平時王和趙住其內。

該報主要內容有：一、堅持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反對妥協投降。聲討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血腥鎮壓軍民。批評中共對國民黨抱有幻想，失掉警惕。要求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戰。二、揭露貪官污吏發國難財；奸商抬高物價，民不聊生。揭露軍隊上層剋扣軍餉，虐待士兵，前方敗退，丟失大半國土。揭露工廠管理混亂，工人生活困苦，炮廠不出炮，電廠常停電。要求改善士兵和工人生活，搞好生產支援前方。三、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至四日，日軍狂炸重慶。接連“疲勞轟炸”，天天有警報，日夜跑防空洞。最終造成校場口防空隧道被炸毀，地下萬人窒息死亡。此事震撼大後方軍民，《工人呼聲》憤怒聲討日軍的血腥罪行，同時批判重慶政府的官僚行為，侵吞防空經費，草菅人命。

出版《工人呼聲》之外，還有臨時性的傳單，署名重慶馬克思主義青年團(M.Y.)。傳單發給工廠和沙坪壩校園的青年工人和學生。王振華還去工廠和學校做調查，辦小型學習班。講中國社會性質、階級分析、革命動力、革命對象和前途。一九四一年春節，磁器口制呢廠劉廣恩等領導該廠工人增加工資鬥爭取得勝利。工人兄弟給他披紅綢，戴紅花，共同慶賀。

情況順利，工廠工作初步開展起來。這可能使青年人麻痺大意起來！

山東老梁是位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一九三八年他在武漢紗廠做工時，國民黨要遷都重慶，紗廠也要遷移，工人要解散。他曾領導工人對廠方說理鬥爭，為數百工人爭取到“遣散費”。一九三九年綿陽六中真理讀書會的同學不斷的進入重慶工廠。青年人熱情奔放，但不習慣工人生活，不適應工廠環境。他預感到隱藏著危險，並提出加強保密，暫停發放印刷品，經過各廠討論後，老梁的提議未得到同意，四一年東北老王主持編報後，又加大對重慶政府的批判力度。事情引發觸角靈敏的特務組織注意。重慶《新華日報》也提出勸告：青年人莫走上危險道路！

重慶軍工系統各廠的特務組織屬於兵工署督察處管轄，兵工各廠都有其豢養的爪牙，兵工二十一廠也不例外，該廠技工訓練班裏也有六中讀書會員，楊壽元在班裏搞個劇團，演出後受到廠內外歡迎。同時，特務也走到他的身邊。一九四一年十月初，中秋節前三天，這位熱情的青年人被捕了。特務們從他的床下搜出印刷品和通信，結果擴大了被捕的範圍。

二十一廠制圖室有張洪仁和王香臣。制圖室的老工程師沈正功同情工人。他得知張洪仁已被捕，馬上轉告王香臣走人。臨時把自己身上的西裝脫下，交王化裝出走。他深情地對王告別說：我十幾年沒見到這種場面啦！(指青年人下廠幹革命。)你們又來了！請走好，王得到逃脫。孟憲章由王轉告出走歌樂山。由他師傅，一位忠誠的老工人保護起來。

同年十月，梁貽在兵工五十廠被捕。他預見這一天會到來，但沒想到特務早已睡在他床邊，特務弄清他的筆跡，檢查他投進廠郵箱內的信件。他被押在朝天門燈籠巷兵工署督察處垸門裏，同時關押 張洪仁、曹慶華等人。張曹等同學不久被押走。同年十月底一個陰雨濛濛的夜晚，梁貽趁門崗睡熟後逃走了。第一次被捕者有楊壽元、張洪仁、任玉璽、曹慶華等十餘人。

隨後，被捕者押在“江北大興廠集中營一戰時青年訓導團”，此時王振華早已離開《益世報》去華岩高等農校教書。獄中的同學都不知道他的新地址，特務們難以找到重慶組織的領導人。但是，重慶政府打日本鬼子極其無能，迫害革命者卻是非常“認真”。他們經過半年的排查，最終找到他的住址。隨即發生第二次逮捕。

一九四二年春天王被捕，同時發現他妻子的來信。在江津國立女子師範讀書的黎潔霜也被捕了。同時接連被捕的還有電力公司工人劉振基、王坤榮和南川飛機修理廠的趙鳳田等人。

范文華是當年各廠的聯絡人，還有出逃的梁貽，他們的通緝告示貼滿碼頭和車站。但是，在市民保護之下，躲過一陣風頭後，他們先後走山路渡過長江。老梁去了雲南西雙版納，一九四六年去了上海。老范和王香臣、蘇學常，還有工人劉毅，逃到貴州遵義去教書。孟憲章跟隨師傅到樂山武漢大學校辦工廠。其他出走的同學轉移到成都各地。張洪仁、楊壽元、任玉璽等後來均被釋放出獄。工人劉振基

等出獄後仍回到電力公司。王振華和黎潔霜先押在“紅岩”白公館，後調到貴州息峰集中營，再回到白公館時，在獄中生了小華和幼華兩個兒子。

一九四一年冬天，閻子桂和妻子杜銳逃離重慶到西安避難。中途路過梓潼時告訴隗寬和曹毓林：重慶出事了，有同學被捕，暫停去重慶。事後得知他在西安王曲軍分校教經濟學，同學們表示不贊成，一九四六年秋天，曹毓林路過西安時，受范文華等的委託，曾當面要求他離開王曲軍校。他表示同意，一九四七年春，他考取公費留學。同年由上海去美國讀書，妻子杜銳到青島工作。

〈注〉：《工人呼聲》編輯部(“白屋”)地址在陝西路 江街 65 號樓上。

七、戰時陪都——重慶(下)

一九四二年春天，大難過後留在重慶的“老人”有張維良、趙芳舉、史逸民，真理讀書會員劉志超、單松齡、尹春德、隗寬以及工人劉振基等人。一九四三年，范文華、蘇學常、王香臣、工人劉毅重又返回重慶，一九四四年王春綠、曹毓林、熊安東、刁長堯也到重慶。組織開始工作，仍用中國共盟四川地委會名。負責人范文華、蘇學常、劉志超、隗寬和劉毅。當時老范說過：過去沒有，現在也無權確定誰是黨、團員，但都相信托的“不斷革命論”，並為之工作；按地區劃分小組，繼續打聽、連系和支援被捕和走散人員的下落和情況。

一九四四年冬天，出版內部讀物《火星》，油印，不定期。地址在兩路口到蔡圓壇的山水溝——復興街。這是一條階梯式的貧民區，沿

街房屋前面是磚木結構，後面爲竹木茅棚。范文華和曹毓林住在一家住房裏進行編印。內容有通訊、時評和轉載文章，一九四五年是世界二次大戰和抗日戰爭的轉折點。同年二月雅璽達會議，五月八日德義法西斯投降。八月六日至八日兩顆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300 萬蘇軍南下東三省。八月十五日天皇 令日本侵略軍投降。形勢急轉直下，令人鼓舞。但人們感到突然和難以理解。

“5.8” 歐戰結束和 “8.15” 日本投降時，都發表了《告重慶市民書》：要求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制訂憲法，懲辦漢奸賣國賊，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待遇，人民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油印品在工廠和校園散發，同時刊在《火星》上。

《火星》上有篇《狂歡之夜》。那是 “8.15” 日寇投降、重慶百萬市民自發游行的記實，我們參加了這次空前的群眾行動。當天傍晚，從兩路口到朝天門，群眾潮水般地湧向街頭，歡呼雀躍，紅燈游動，百花怒放，鞭炮齊鳴。平時煙霧朦朧的山城，活了！被壓抑了八年之久的人民熱情全部釋放出來，多麼偉大的力量啊！人民自發地慶祝抗日戰爭的勝利，游行一直持續到午夜，方才各自散去。

還有一篇《希臘國內革命戰爭》，真理讀書會會員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會帶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世界革命又會推動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並激發中國勞動人民的革命覺醒。當時我們注意到波蘭華沙人民起義，巴黎工人武裝和義大利的地下游擊隊。同時也注意到二戰結束之前美英和蘇聯召開過德黑蘭、波茨坦和雅

爾達會議，三國政府重新瓜分了東歐、中近東和遠東的勢力範圍。斯大林和邱吉爾同樣懼怕世界革命。結果，華沙起義在孤立無援中被德國法西斯鎮壓了。英義進佔歐洲大陸後，斯大林迫使法共和義共等國的工人放下武器，巴爾幹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但是，靠近地中海的希臘仍屬英國領地。

一九四四年冬天，希臘工人武裝力量解放了全國，並和入侵的英軍開展了激戰，革命戰爭達半年之久。工人武裝由希臘社會黨、共產黨和第四國際托派組建了聯合戰線。最初，革命戰爭在全國取得重大勝利，後來，社會黨、共產黨都先後退出了戰鬥。托派武裝堅持良久，最終失敗了。這篇文章是根據當時重慶《大公報》記者的連續報道，再系統地整理和編寫出來的，二戰後世界革命的失敗，帶來的是長期的“冷戰”，那是後話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節期間，重慶爆發了“胡世和慘案”。<注>電力公司的工人劉振基等領導了這場反抗國民黨特務暴行的正義鬥爭。當時，鄒容路某文化協會餐廳竊電被查獲，電力公司領班劉振基師傅和電工胡世和等前往索賠罰款。該餐廳不認賬，引起打鬥，特務經理田凱當眾（約百人）開槍，並殺害胡世和，隨而引起公憤。劉振基在全廠職工和社會進步人士的支持下，在古刹長安寺內設靈堂公祭胡世和。電力公司職員趙芳舉等撰寫《告全市人民書》。並向各界揭露胡世和被害真相，要求嚴懲凶手。重慶《新華日報》全體職工敬送輓聯。曰：“特務橫行何處去；自由光明幾時來。”公祭約十天。靈堂上放滿了花圈和輓

聯。市民、工人、學生前往吊唁者紛至沓來。重慶的讀書會員都去致哀。最終死者家屬得到撫恤金，胡世和公費殯葬。重慶工人抗暴鬥爭取得勝利。這也是重慶人民反抗重慶政府法西斯統治的勝利。

一九四二年以後，重慶組織調整了佈署，堅持城市產業工人工作之外，有條件的真理讀書會員開始進入高校，為擴大社會各階層的影響作準備。自一九四三年起考取時在四川、雲南、貴州的高校會員有：四川大學楊承志，中央大學張聖時和熊安東，復旦大學杜文林，重慶鄉村教育學院王香臣，西南聯合大學尹純德，東北大學張洪仁，浙江大學曹毓林，山東大學楊壽元。以上八所高校，除川大和教育學院外，其他高校一九四六年復員遷回到南京、上海、北平、瀋陽、杭州和青島等城市。

<注>：“胡世和慘案”發生地點，是在蒼坪街（今鄒容路）中韓文化協會餐廳。烈士靈堂和悼念大會地點，是在通往朝天門的長安寺。

一九四六年以後，解放戰爭中，在高校讀書的會員們，都在各自的大學裏，參加了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鬥爭，即世人熟知的反內戰，反飢餓、反暴行；爭和平、爭民主、爭自由。同時揭露駐華美軍欺壓中國人民的罪行，並要求蘇聯歸還中長鐵路和大連旅順軍港，但這些活動超出了本題目的界定之外，那都是後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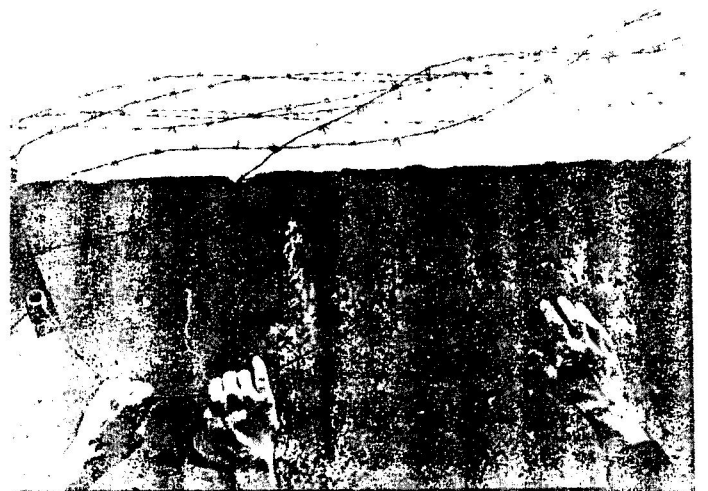
最後應該說明：一九三九至四九年在重慶犧牲和病死的同志、戰友和同學。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慶解放前夕，王振華和黎潔霜及其兒

子小華和幼華四人，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館，同時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犧牲壯烈。解放後評為革命烈士。（請參考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報》，同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同時被殺害的還有王坤榮和趙鳳田（金聲）。王坤榮也被評為革命烈士。趙鳳田一九四二年在南川飛機修理廠被捕，四五年出獄，四九年三月在重慶太平門又被捕，同年十一月在中美合作所被殺害。（今天的“渣滓洞監獄”原男監內樓上有他的名字，無其他資料。）一九四一年李廣智和王學誠患霍亂病死。一九四五年刁長堯肺結核病死，同年單松齡肺炎病死。向死難者致敬。

謹以此文悼念以上的死難者和烈士。

二〇〇四年十月



廣西托派史話

蔚然

序 曲

這是刀光劍影的年代。這是腥風血雨的年代。神州大地，到處屍堆如山，血流成河，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青年人和老年人，使人感到窒息和絕望。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這歌聲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到處宣揚。人們沉醉在勝利的歡樂中，開慶祝會，開歡迎會。誰料想到，就在人們興高采烈，敲鑼打鼓迎接勝利的時候，當日被捧為革命領袖的蔣介石卻在暗地裡磨刀霍霍，籌劃著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

1927年4月初，蔣介石召集何應欽、吳稚暉、陳果夫、陳立夫、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古應芬、李石曾、張靜江等人，先在白崇禧設在上海龍華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後在舊上海道尹公署的樓上，秘密召開所謂「清黨」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就在四月十二日這一天，蔣介石一夥就在他們所控制的地區，包括大江南北各省、廣東、廣西等地，完全籠罩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

在廣西，負責執行所謂「清黨」的，是「臨時清黨委員會」。據黃紹竑的回憶，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黃旭初、朱朝森、黃華表、黃劍鳴、伍廷飏、呂競存、蘭呈祺。各地區的「清黨」負責人，南寧區：黃華表，梧州區：龔傑元，柳州區：伍廷飏，桂林區：黃同仇。在“4·12”那一天，在南寧被捕的共產黨人有鄧哲、梁西園和一些國民黨左派份子如梁六渡等35人。4月18日又逮捕29人，直到那年的8月31日為止，陸續遭到逮捕的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為數很多。各地被捕的人先後都押送到南寧集中聽候處理。

9月1日，是國民黨廣西當局在南寧開始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的血腥日子。那一天被殺害的有鄧哲、梁西園、梁六渡等15人。

10月9日，又殺害鄧匡、周飛宇等十四人。這些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臨刑時都非常英勇，視死如歸。他們高呼「中國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並相約「第二次再幹」。有些人在行刑前法官問及姓名年齡，竟大聲呵斥法官道：「老子萬萬歲！」真是氣壯山河。

1930年底，張雲逸、鄧小平領導的紅七軍退出廣西後，廣西國民黨軍閥特別重視「圍剿」活動在東蘭鳳山一帶由韋拔群領導的農民武裝；派出龐大的部隊對山區進行封鎖，封山、封洞、見村燒屋，見林燒山，見人即殺。在蔣桂戰爭結束後，桂系新軍閥退守廣西，當即在1932年秋在南寧召開軍政會議，決定由廖磊帶部進入東蘭鳳山地區，把方圓三、四百里的山石場重重包圍，步步進逼，逐山搜索，強迫山石場居民集中在指定地點，把山石場房屋全部燒毀。桂系軍閥還懸獎良洋一萬元捉拿韋拔群，良洋八千元捉拿陳洪濤。是年的10月18日，韋拔群即在嚮茶洞被叛徒韋昂殺害。桂系新軍閥還割下韋拔群的頭，先在中和鄉，後又拿到東蘭縣城去「示眾」。後來又把韋拔群的頭裝在玻璃缸內拿到南寧正在召開的全省運動會場上「示眾」。

就在這樣一片白色恐怖氣氛的籠罩下，二十年代初前後出生的一代青少年，親身目睹共產黨人威武不屈、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並為他們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動。這些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當中，有的就是自己所敬仰、所熟悉的親人或師長；他們的悲壯犧牲，不能不引起內心的陣陣悲痛。同時，這一代青少年也親身目睹了桂系新軍閥的兇惡殘暴，他們口口聲聲「建設廣西，

復興中國」，實際上做的卻是殺人不眨眼的土匪行爲。一面是英勇不屈，流血犧牲；一面是暴虐成性，殺人如麻。一面是流離失所，啼飢號寒；一面是杯盞交錯，歌舞昇平。這些現實生活中的強烈對照，加之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相繼發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這一切不能不在純潔的青少年心靈中激起陣陣浪花：中國到底要往何處去？社會的出路何在？個人的出路又何在？……一連串的疑問縈繞在這一代的青少年腦海中，時隱時現，反反覆覆，回蕩不息！

（一）三十年代初在廣西活動的托派份子

1925-27 年大革命時期，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的政策是大力支持孫中山及其後的蔣介石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的政策。大革命以蔣介石國民黨屠殺工農群眾和共產黨人而宣告失敗。這說明了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當時推行的政策是錯誤的。

大浪淘沙。曾投身於大革命洪流中的共產黨人，面對革命失敗的嚴酷事實，有人消極，有人叛變，也有人在沉痛地思考。恰在這個時候，在中國派往蘇聯留學的黨員學生中，受到聯共（布）黨內鬥爭的影響，許多人都贊成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並參加了聯共（布）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組織。這些人當中，有少數人回國後便組織起來，分別建立了三個托派反對派小組，會同國內以陳獨秀爲首的一批也贊同托洛茨基觀點的老幹部結成的反對派小組，於 1931 年五·一勞動節召開了四個反對派小組的統一大會，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全國統一的托派組織，以上海爲活動中心，出版刊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宣傳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但在蔣介石白色恐怖的統治下，這個托派小組很快便被蔣介石政府發現，並在 1931 及 1932 年連續兩次遭到破壞。國民黨政府把以陳獨秀爲首的全部領導成員送進了國民黨的監獄。

在早期的中國托派組織中，施雲、秦強、賀

希、張特都會是最早的成員。他們在托派組織遭到蔣介石國民黨的破壞之後，相繼逃到廣西來避風頭。張特就是張威遐，他回到廣西就脫離托派組織，與王公度，謝蒼生等人一起爲新桂系效力，成爲李、白、黃的得力幹將。

1932 年春季學期開始時，施雲、秦強、賀希等人來到南寧省立一中執教，後來，前二人也曾在桂林師專、桂林高中任教。秦強在 1948 年因爲貧病交加，無力醫治，病死在桂林。他死後，學生們曾抬棺上街遊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政策和腐敗統治。施雲則一直到桂林解放前，才離開桂林高中教職，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賀希在省一中呆的時間不長，1932 年秋學期開始前便離開了。這三個人當時雖然都脫離了托派組織，在教學期間，雖然沒有公開宣傳過托洛茨基主義，但他們對學生卻起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啓蒙作用。他們經常介紹和指導學生閱讀十月革命文學，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諾夫和列寧的著作，以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爲黃埔軍校編寫的政治教材。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當時學校的圖書館也有收藏，學生們很容易借來閱讀。在施雲、秦強、賀希等人的影響下，那些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思想上政治上正處於徬徨無出路狀態的青年學生，很快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並確立了人生奮鬥的目標：爲實現社會主義獻身。

（二）廣西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

1932 年秋季學期開始時，賀希已經離開省一中。受他影響較深的林華援偕同其他三位同學在學期開始後不久，便毅然放棄學業離校出走，到廣州去找他們的老師投身革命。當時全校同學都爲他們的出走轟動一時，猜測紛紜，大多數人都說是「找共產黨去了」。

林華援是南寧郊區雙定鄉人，生於 1915 年 9 月，1931 年考入南寧省一中，成績一般居同學中的前列，深得教師喜愛。他與其他三位同學離校到廣州後，沒有找到他們的老師，也沒有找到共產黨。四個青年也就祇好各找門路，各奔前程了。

林華援不得已轉回南寧，適逢南寧染織廠招收學徒，他考取了，由該廠送去上海永安第三紡織廠學修紡機。當時正好賀希就在紡織廠所在地滬西區一帶活動。老師和學生在偶然的機會裡相遇了。於是，在賀希的帶引下，林華援參加了上海托派的組織活動，並認識了陳其昌。林華援就這樣成了廣西第一個本土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1934年下半年，林華援學成回南寧紡織廠履行學徒合同。1936年初，他應賀希的邀約，離開南寧染織廠到上海去參與托派活動。那年春節前數天，他到了上海，見到了賀希。賀希告訴他，過了春節，便可以找門路到鴻章紗廠去工作。

春節過後第三天，賀希一早出門，一直沒有回來。翌日傍晚，陳其昌來了。林華援把昨天賀希出門一直未回的情況告訴他，並請求他幫忙。陳其昌答應了，相約再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便走了。事後得知，賀希那天出門後，便被國民黨特務跟蹤捕去，以後曾與先期被捕的尹寬、鄒魯一起解去南京關押，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出獄。賀希於1983年3月7日病死於江西萍鄉郊區公社聯星大隊。

林華援依約定時間和地點去與陳其昌相會。陳對他說，組織有些工作需人去做，祇是生活比較艱苦，如果願意，馬上就可以去做。林表示願意。過了兩天，陳其昌來到林的住處，把他連同全部傢俬一起搬到法租界古拔路一個弄堂騎樓上面的房間去。

原來這兒已經住有華鎮彬母子倆。華原是托派的極端簡陋手工操作的印刷機關的創始人之一。原先有個排字工人小栗，是上海滬東區的一個托派份子。因為失業，為了吃飯，買了些鉛字，擺個攤子印名片、小廣告之類賺錢過生活。尹寬發現這個情況後向組織建議籌點錢，讓小栗和華鎮彬負責用這種方法印刷托派的書報和文件。開始時最先印出了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法國往何處去？》，以後便出版托派的《鬥爭》報。

林華援參加這個印刷機關工作時，這個印刷

機關是由當時《鬥爭》報的主編陳其昌負責。林華援是從《鬥爭》報第二期開始參加工作的。但沒過多久，華鎮彬和他的母親要離開印刷機關，為了保密，印刷機關祇好遷移。林華援由此負起了檢字、排版、印刷出版的全部工作。到1936年下半年，林即邀約他的要好朋友毛鴻鑑和丁肇荃到上海去與他一同工作。這樣，又有兩個廣西籍人成了托派份子。

林華援參加托派印刷機關工作時，生活條件很艱苦，托派組織供給的包括房租，印刷費，工作人員生活費，開始時每月祇有40元，其中房租12元，三個人的生活費18元，每期《鬥爭》印刷費約10元。1939年以後，物價高漲，費用增加，每月總開支也不超過80元。

自從林華援去上海參加托派印刷機關工作之後，他便把托派的書刊源源不絕地輸送到廣西給他熟知的同學和朋友閱讀，這樣一來，托洛茨基主義便慢慢地在廣西傳播開來，特別是在1936-38年間，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所及，幾乎成了一股潮流。

林華援在1939-40年間，曾有一段時間到香港負責印刷托派華南區組織機關報的出版工作，被香港英國政府密探發現，匆促轉移後又回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印刷機關工作，直到1941年8月《鬥爭》報停刊後才轉回南寧，在南寧源興隆炮竹店當店員，1947年作為源興隆開設的一家布店的採購員常駐廣州。不久即轉去香港入《華商報》做排字工。

1949年間，由鄭超麟、王凡西領導的托派少數派召開建黨大會，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林華援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2年12月22日冬至夜，全國實行大逮捕，把托派一網打盡。林華援在廣州被捕，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期屆滿時，政府工作人員要求林華援“交心”，林表示：自己沒有改造好，最好不釋放，因為自己仍堅持信仰托洛茨基主義，仍認為當年

蘇聯黨爭，對的是托洛茨基，錯的是史達林。根據林華援這樣的“交心”，被認為是敵視和醜化史達林，加判有期徒刑十年。1972年刑滿，但仍需在上海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留場就業」。1979年7月，才與鄭超麟等人一起得到落實政策，恢復公民權。1980年8月被送回南寧定居。1983年4月11日，因肺心病，醫治無效逝世，終年69歲。

這就是廣西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生的歷程。

（三）叩門讀書會

1933年秋季學期開始後，當時在南寧省一中讀書的徐汝璋、毛鴻鑑、蘇燕海、周孔瑞等六人，在施雲、陳強等老師的影響下，自發組成一個秘密讀書會，自稱為「叩門讀書會」，取叩門入室，尚未登上知識殿堂；而這個知識殿堂究竟是什麼還不可知之意。參加者各就個人興趣的所在，選讀自己喜歡的書籍，有讀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也有讀社會科學的書籍，甚至還有選擇《共產黨宣言》的。讀書會規定每星期六晚飯後在徐汝璋家裡集會，各人介紹自己的學習心得，並進行討論，互相鼓勵，互相促進。

這個讀書會存在時間不長，祇持續到1934年夏。由於害怕被發現為秘密組織，便自行解散了。

但這種秘密讀書小組形式，很適合當時正處在徬徨中思想上無出路的青年學生尋求知識追求真理的需要。因為組織這種秘密讀書小組的都是人數不多，平時比較接近，比較友好，彼此都很了解的同學，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坦誠相待表露自己的心情，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不感到有任何約束和壓抑，不害怕受到任何歧視、排斥和打擊。所以，自從有了「叩門讀書會」開了這個頭之後，一直到1938年，省一中每學期各班級中都有這種自動組織起來的秘密讀書小組存在。它們甚至沒有名稱章程，祇是三兩個要好的同學在適合的時間，適合的地點聚集在一起討論研究共同感興趣的問題罷了。這種秘密的讀書小組大多

以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為中心，所讀的書，開始都是當時共產黨員編寫的科學社會主義而公開出版發行的通俗讀物，然後進而閱讀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等的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費爾巴哈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論歷史一元論的發展》等等。這些秘密讀書小組討論的問題，範圍很廣，涉及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有關人生、社會、哲學、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熱烈探討研究的對象。

但自從林華援到上海參加托派組織機關報的出版工作之後，這些秘密讀書小組便開始有托派的書刊在暗中傳閱，除《鬥爭》、《火花》等刊物外，也有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等。這樣一來，托洛茨基主義便在很多青年學生中傳播開來，影響所及幾乎成了一股潮流。正是通過這些秘密讀書小組的活動，使得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的青年學生也愈來愈多。在1936-38年間，據說有這種傾向的青年學生約有二百多人。其實，除了已經去上海參加了托派組織的林華援、毛鴻鑑和丁肇荃三人之外，少數一部份人在政治上可以算得上是個托洛茨基主義份子，但還遊離於托派組織之外。另一部份人則僅僅是不滿意史達林排斥異己，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而同情被迫害的托洛茨基而已。最後，佔大多數的一部份人甚至僅僅是在學校中同上述的兩部份生活上比較接近的所謂「同情者」罷了。這三部份人加起來才可能是人們估計的「二百多人」這個總數。

（四）抗日時期南寧的學生運動

抗戰興起，南寧的學生抗日運動發展很快，這與當時南寧各中學校中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或同情托派的學生的抗日活動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在省一中南寧高中，南寧女中，比較積極的活動份子有蘇燕海、李伊人、何春華、侯芝才、廖淦成、方正、麥俊奇、黃贊明、黃德楷、李啓成、

陸俊、何伯擎、黎燧生、李培貴、侯國潤、農培蕃、梁榮陞、葉家澤、陳傳誼、黎華瑞、葉明生、鄭安榮、寧廣居、曾輝哲、李智、謝希文、蒙方正、孔憲模、楊士足、姜鳴渭、滕元斌、林龍章、盧漢忠、韋焜章、梁水姬、曾佩卿、唐少鳳等等。這些人曾在一個時期領導了各學校的一些班級、學生自治會和南寧市抗敵後援會的各種抗日宣傳活動。他們籌辦出版學生抗敵後援會的會刊《抗敵》，前後共出版了8期。在《抗敵》上撰稿的有蘇燕海、黎華瑞、梁榮陞、李伊人、楊士足、謝希文、孔憲模等人。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有關抗日的時事座談會和專題討論，組織各學校的同學來參加。陳傳誼、李啓成、黎燧生、廖淦成等人都參加或主持過這種會議。他們還組織熱愛話劇的同學如盧發科、吳樂亨、梁平川、舒家俊、盧漢宗、韋焜章、陸國燦、黃木生、黃德楷、雷順忠、何伯擎、梁水姬等人演出了街頭劇和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及大型舞台劇《民族萬歲》、《台兒莊之戰》等。一時間，使南寧的學生抗日戲劇運動蓬勃開展開來。

在南寧學生抗日運動開展當中，經過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或同情托派的學生的積極活動，使得托派關於抗日的主張得以在學生中暗中或半公開地傳播，同中共的抗日主張形成矛盾和對抗的局面。

(五) 學生軍中托派份子的活動

廣西國民黨當局曾三次組織過學生軍。第一次是在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巨頭與廣東的陳濟棠聯合反蔣時的「兩廣事變」，即所謂的《六一運動》。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後，廣西國民黨部隊要北調，因而組織學生軍隨軍北上開赴抗日前線做宣傳工作。第三次則是在武漢淪陷後，廣西直接面臨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威脅，廣西國民黨當局又一次組織第三次學生軍做抗日宣傳工作。這一次比前二次規模大得多，影響也較大。這三次學生軍都有托派傾向的學生參加，現分別略述

如下。

(1) 第一次學生軍

這次學生軍是以桂林師專學生為主，各地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有少部份人參加。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桂林師專有毛鴻鑑、麥俊奇、方正、黃贊明等人。毛鴻鑑在學生軍集中到南寧集中訓練時，即與丁肇荃二人應林華援的邀約離開學生軍前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的出版工作。南寧方面參加學生軍的有李培貴、廖淦成等人。從梧州來的學生有以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為首的，包括魏穎如在內的一些女學生。這次學生軍的活動，名義上是宣傳抗日，實際上以防範蔣介石的藍衣社特務活動為主。由於蔣桂矛盾很快得到“和平”解決，這次學生軍也就很快結束。解散後的學生有由廣西當局安排工作的，也有自願回學校繼續求學的。

在上述參加學生軍，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學生中，值得一提的是黎琦清其人。在這裡要簡略敘述她的悲壯事蹟。

黎琦清，後改名為黎潔霜。蒼梧人，1936年時在梧州女中讀書。參加第一次學生軍後，與魏穎如等同學一起來到南寧參加集中訓練。與麥俊奇、方正、黃贊明、毛鴻鑑等人來往很密切，為人沉靜好學，平時抄閱托洛茨基的著作，深入探討，有托派思想傾向。學生軍解散後，她回梧州高中讀書，與何伯擎較接近，互相切磋學問，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1939年，她隻身前往香港，參加香港的托派組織，結識了王振華，並互相愛慕，共訂終身之好。1940年冬，黎琦清偕同王振華由香港返回梧州，即住在黎的家中。但她的家庭不同意這門婚事。後來，王振華到了重慶主持當時托派重慶組織的工作。跟着黎琦清也在1941年8月去到重慶與王相會，並考取了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1942年春，國民黨政府對重慶托派組織開始大搜捕，王振華在華岩高農校被捕，並搜到黎琦清的相片，和她與王的來往信件，當即到女子師範學院將黎逮捕，與王一

起關押在重慶。一年後，王與黎作為重犯要犯被押送到貴州息烽集中營監禁。1946年，該集中營撤銷，他們又被押回重慶，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館監獄。就在這一年黎與王在監獄中成婚。1947-1949年，他們夫妻倆在獄中先後生了兩個孩子。1949年冬，重慶臨解放前，國民黨對被關押的政治犯實行野蠻的大屠殺，王振華黎琦清一家四口與其他的共產黨人和革命民主人士一起慘遭殺害。

據白公館監獄僥倖脫險的志士們的回憶，王、黎在關押期間，意志非常堅強，雖然受到殘酷的刑訊，受盡百般折磨，但從不屈服。「在監獄裡，敵人曾以“感化”手段引誘王振華“合作反共”，遭王嚴詞拒絕，他們又以同樣手段妄圖收買黎潔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在生了第二個孩子後，「特務頭徐遠舉要她寫悔過書取保出獄，她堅決拒絕了。」（見1983年8月31日《重慶日報》：《火中的鳳凰》）。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編的《黨沒有忘記他們》一書中《一對寧死不屈的患難夫妻》一文也記有同一件事說：「1949年初，黎潔霜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殘暴的劊子手楊進興沒有兒子，見剛生下不久的王幼華乖巧，便威脅王振華，妄想把王幼華抱給他作兒子。王振華知道這個可恥的目的，轉身就走。黎潔霜知道後罵道：「絕不給那王八蛋作兒子。夫妻倆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愛憎分明，表現了他們清白高潔的氣質」。

該文對王、黎一家四口最後受害時的表現還作了如下的敘述：

「劊子手們從白公館樓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華、黎潔霜和兩個孩子。夫婦倆在敵人的長期折磨下，身體雖然十分虛弱，還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無懼色地邁着堅定步伐，高呼口號，向刑場走去，在鐵窗內的難友們，含着淚花為他們送別……。」

「臨刑時，兩歲多的王小華看見押着他們一家的劊子手們一個個兇神惡煞的樣子，嚇得大哭

起來，不住地叫喊：「媽媽，我怕！媽媽，我怕！」黎潔霜看着緊緊伏在他們夫婦倆身上的兩個孩子，聽着兒子淒慘的哭聲，母親的心都碎了。……她轉過身去對押着她的劊子手楊進興說：「你們多打我幾槍，把孩子放了」。楊進興兇狠猙獰地一笑，大聲吼叫：「把孩子一起打，斬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這群狗講什麼？」王振華高聲喝住妻子。劊子手們奪過他們手中的孩子，就在他們跟前把孩子殺了。黎潔霜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王振華黎潔霜一家四口就這樣慘死在國民黨劊子手的屠刀下。王振華時年38歲，黎潔霜29歲，王小華才兩歲多，王幼華僅有八個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死難烈士的工作中，王、黎二人終因是托派份子，不被列為革命烈士，含冤長眠在歌樂山下，「不為人們所知」（《火中的鳳凰》）。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多方人士的奔走呼號，才得「實事求是」地補評為革命烈士。真是：「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注）黎琦清是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廣西第一個托派份子。

（注）參看趙芳舉：「《永恆的懷念》——王振華烈士生平憶略」。（未刊稿）

（2）第二次學生軍

廣西當局組織的第二次學生軍，也是以桂林師專的學生為主，也有少數中學的學生參加。這次學生軍是隨廣西軍隊開赴抗日前線的第五戰區做抗日宣傳的，不在省內工作。參加這次學生軍的有托派傾向的學生有黃贊明、麥俊奇、方正等。

（3）第三次學生軍

國民黨廣西當局在1938年11月着手組織第三次學生軍，共三個團。當時從上海回到廣西的毛鴻鑑發動南寧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積極參加到學生軍中去進行抗日工作。他本人也帶頭參加。除毛鴻鑑外，參加的人還有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榮陞、梁庭詠、梁

亮、李啓成、楊士足、鄭安榮、姜鳴渭、韋焜章、江國豪等人。這些人在學生軍中都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毛鴻鑑、梁庭詠、梁亮、姜鳴渭和韋焜章等編排抗日戲劇參加第三團在馬嶺的演出活動。這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本以為在學生軍中可以為抗日戰爭盡一份力量了。但他們萬萬沒料想到，恰好就在那個時候，正是王明、康生一伙無恥誣蔑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托匪漢奸」的時候。這股「反托」的風氣也吹到了學生軍中。那些盲目跟着指揮棒轉的「反托」英雄們，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負責人、排長、班長，都大有人在。他們「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要開展反對漢奸，托派鬥爭的指示精神，……決定發動反托鬥爭」。他們認為「進行反托鬥爭，將有可能得到學生軍上中層領導的默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他們還「通過在學生軍政治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系頭面人物，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見 1988 年 11 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廣西黨史資料叢書·《黨在廣西學生軍》第 10 頁）。他們採取特務的方法，如跟蹤，釘梢，監視，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的手段；有的人竟然無恥到暗中在他要打擊的對象衣服的背面偷偷寫上「托匪」二字，進行人身的污辱。總之，祇要是他們懷疑是托派的人，一律予以排斥和打擊。

這場「反托」風暴席捲了整個學生軍團，從迫走了毛鴻鑑，到 1939 年春節過後不久在第三團逮捕李啓成，繼而不久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焜章等 13 人，達到了頂點。

先是在這些人被捕之前，據說在從桂林到柳州的行軍路上，有三個女同學畫的街頭壁畫上，嚇然寫有「共產黨蹂躪下的慘狀」幾個字。這個故事的編造者就是當時的團政治部主任本人。根據這位政治部主任的一面之辭，沒有任何物證，人證，和其他的旁証，竟然對那三個女同學一次又一次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但始終沒有得到人

們所需要的供認。

在逮捕楊士足等 13 人之後，人們把他們送去賓陽縣監獄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別對他們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認背後指揮者。在百般折磨之後，施刑者和審訊者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證，這 13 位抗日的同學竟平白無辜被關押了半年之久，受盡了牢獄之苦。

這就是那些「反托」英雄們一再誇耀不已的，在學生軍中泡制的「反托鬥爭」的業績！

在人們蓄意泡制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和同情者，不可能在學生軍中呆下去為抗日戰爭出力，被迫紛紛退出了學生軍。即便是那些與托派組織、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隨風倒而有獨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會遭到排斥打擊的劫難，因而怨聲不絕，這才真正是抗日戰爭中的大不幸呢。

（六）《孤燈》、《燎原》、《紅旗》

自從毛鴻鑑從上海回到廣西後，廣西的青年學生中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才開始有建立政黨組織的願望和要求。但對於如何建立政黨組織，如何開展政黨工作，認識還是非常模糊的。有的人以為，在革命高潮到來之時，祇要登高一呼，便會招來千軍萬馬，向反動統治者進行沖擊。有的人以為可以學列寧辦《火星報》的樣，辦起一個雜誌，以此為中心建立起革命的領導核心來領導群眾鬥爭。也有人想到工人中去，在工人中扎根，作為建立政黨的基礎。思想上意識上的不一致，必定導致行動上的不一致；1939 年以後，廣西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自然也祇有各行其是了。

1939 年毛鴻鑑離開學生軍後到了衡陽，便與趙鈞、白先明、莫獻廷、黃德楷等人企圖在湘桂鐵路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但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人，自己既做不成工人，也無法接近工人，更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各圖出路：有的人回到桂林，如黃德楷，有的考入鐵路的各種訓練班，如

趙鈞、莫獻廷。這些人就這樣各散東西，連原來由這幾個人組成的小組也就不存在了。

1941 年秋，集中在桂林的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如李啓成、駱椿柏、黎華瑞、蕭文松、寧廣居、黃贊明、廖淦成、陸如滿、曾佩卿、唐少鳳、鄧超蓮、韋興智等人，經常在李啓成家中聚集，沒有任何形式地互相討論各種問題，交換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同意辦個秘密刊物，來發表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意見。這樣便有了油印的秘密刊物《孤燈》（後改名為《燎原》）的出版。由於這種秘密油印刊物不能公開出版，祇能在自己這個小圈子裡傳閱，除了做到自己人交流思想之外，在群眾中根本不起作用。

同一時期，集中在南寧的蘇燕海為中心的一伙人，如何伯擎、梁福康、陸俊、葉家澤、鄭安榮、梁庭詠等人，也辦起了名為《紅旗》的秘密油印刊物，祇出過兩期，也如同桂林的《孤燈》一樣，除了自己這個小圈子的人之外，群眾中根本不知它的存在。

顯然，這些以辦秘密刊物為中心集合起一班人組成政黨的企圖是落空了。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當中，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在日本侵略者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戰爭的烈火燒遍廣西之時，這些分別集中在南寧、桂林兩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到處星散了。

（七）參加南寧郊區民眾抗日武裝鬥爭中的托派份子（注）

抗日戰爭中，南寧在 1939 年和 1944 年曾兩次淪陷。第一次淪陷時，國民黨邕寧縣政府組織成立邕寧縣戰工隊，方正任副隊長，麥俊奇擔任分隊長職務。在崑崙關大戰時，國民黨政府又成立邕寧縣民眾抗日游擊隊，李伊人、盧漢宗擔任中隊的政治指導員職務。游擊隊實際祇擔負崑崙關大戰西線南寧西郊地區的安定，和支援前線正規軍的戰鬥。

南寧第二次淪陷時，南寧西郊各鄉為了確保地方的安寧，先後組織了抗日自衛隊；如由李伊

人負責，盧漢宗出任政治指導員的「那龍民眾抗日自衛隊」，由寧廣居協同其他人領導的「金陵民眾抗日自衛隊」等。1945 年 2 月間，各鄉的民眾抗日自衛隊又聯合組成了「壇洛區民眾抗日自衛隊」，推舉李伊人等為正副隊長，寧廣居、盧漢宗為政治指導員。

這些民眾抗日自衛隊實際上都是由當時任國民黨邕寧縣縣長鍾震霄領導和控制的。這些自衛隊除維持地方治安，宣傳抗日之外，還配合退守廣西的國民黨六四軍投入多次抗日軍事行動。在 1945 年 4 月 17 日的夜襲金陵寧村的日本兵巢穴的戰鬥中，寧村村長寧廷松不幸飲彈犧牲。鍾震霄縣長在 5 月 7 日主持召開了寧廷松烈士的追悼會。六十四軍一五六師四六七團團長特為寧廷松勒石樹碑，以為永久紀念。碑文全文如下：

「1944 年 12 月 12 日，敵軍騎兵二百餘竄到寧村，奸淫擄掠，無所不為。鄉親在敵蹄蹂躪下，呻吟凡四個月。該鄉愛國人士寧廣居、寧滿道、寧瑞積、寧耀東等奮起組織金陵民眾抗日游擊隊，於 1945 年 4 月 17 夜配合我團三百餘人襲擊寧村敵巢，寧廷松村長身先士卒，英勇無比，不幸陣前飲彈犧牲，氣壯山河，令敵喪膽，次日即狼狽潰逃，克服寧村，萬民歡慶。我團鑒於寧廷松村長為國捐軀，特予勒石樹碑，以慰忠魂，永垂不朽！

國軍六十四軍一五六師四六七團團長陳亞人團政指黃文楷同立」

立此紀念碑的背面，還刻有寧廣居寧耀東撰寫的《日寇陷村記》一文。全國解放後，寧廷松烈士的紀念碑曾被埋沒。

由於這些抗日游擊隊是國民黨領導和控制的，所以在完成了規定的戰時任務之後，便為政府改組解散。那些參加游擊隊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在游擊隊解散後，祇好捲起包袱走路了。

（注）這裡所說的「托派份子」祇是指當時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

（八）果德縣中和南寧商報

1945年春，廣西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曾企圖利用侯甸出任果德縣長正在搜羅部屬的機會，讓陳傳誼去充當他的民政科科長。並通過侯甸使何春華任果德縣國中的校長，從而使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集中到該校去充當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和各班級的老師等職務。並以此為基地，來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當時到該校去任職的人有：黃德楷、蘇燕海、陸俊、梁庭詠、楊士足、黎燧生、徐汝璋等人。但這些人在教學中並不能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相反，各人卻有自己的小算盤，特別是何春華，他祇一心想如何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針把教學辦好，對政治活動已無興趣。其他的人也深深感到在小小的山城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因此，在1945年下半年學期結束之後，一度曾集中到果德縣國中的人，又各自尋求新的出路，四處星散了。

首先是黃德楷，在1945年下學期尚未結束之前，便應當時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黃中廬的邀約回到南寧籌辦「南寧商報」。該報是由當時南寧商會會長賴壽銘出資出版，以黃中廬為政治後台。社長是賴壽銘的外侄楊某充任。黃德楷則出任總編輯。

他拉了一些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充當編輯部的班子。甚至把原在果德縣國中任職的人也拉了過去，這使何春華十分惱火。到「南寧商報」去任職的人有：蘇燕海任資料室主任，兼主要撰稿人。梁庭詠任副刊編輯。黎燧生任資料幹事。姜君羊任記者。這些人在報社裡也不可能利用報紙來散播托派思想，更不可能把報紙變成托派的報紙，這是不言而喻的。祇是有一個時期，因黃德楷的關係，「南寧商報」曾經充當了上海托派組織的公開刊物《求真》和《青年與婦女》的代銷處。

1946年夏，由於黃德楷與社長楊某的矛盾激化，黃德楷領導的編輯部全體成員集體辭職，由此離開了商報。

（九）到大城市去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廣西有托派思想傾向的

人中，許多人鑑於多年來在省內知識青年學生中開展托洛茨基主義的傳播沒有多大進展，因此都有到省外大城市去尋求發展的打算，認為祇有到大城市去，到工廠中去，到工人中去，才能真正在工人階級中開展組織的工作。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從1946年下半年起，有不少人先後都離開了廣西，分別到上海、香港、廣州等地去。如徐汝璋、蘇燕海、陳傳誼、梁庭詠、許任新、鄧強等人去了香港；去上海的則有李啓成、何伯擎、李培貴、梁必亮、楊士足等人。姜君羊、廖真如、黃毅等則去了廣州。這些人都分別參加了香港、上海和廣州等地的托派組織。從此時起，這些人才正式成為中國托派的一份子。特別是去香港的人，他們都能到工廠去做了工人，或深入到工人中去，成了當地工人運動的積極份子。

（十）廣西托派的建黨活動

1946年以後，除了那些到上海、香港、廣州等地的人之外，廣西省內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大多集中到南寧和桂林兩地。在南寧的有：麥俊奇、梁福康、雷潤清、陸俊、盧漢宗等；在桂林的則有廖淦成、駱椿柏、黎華瑞，寧廣居，趙鈞、梁良、陸如滿、韋興智、黃贊明、鄧超蓮、曾佩卿等人。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上海的托派中央由於對抗戰性質問題的分歧而分裂為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和以鄭超麟、王凡西為首的少數派。而廣西的人對這兩派祇視為是同一組織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意見不同的派別而已。因此，不論是南寧或桂林的人，都與兩派保持着聯系；既為多數派的《求真》，《青年與婦女》積極推銷，也在自己人或同情者中傳閱少數派的《建立》和《新旗》。在一般說來，桂林的人，多數傾向於多數派，而南寧的人則傾向於少數派。

1947年下半年，托派多數派開始籌備建黨，號召各地方的托派組織和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積極行動起來，發展成員，擴大組織。當時在香港的蘇燕海、陳傳誼、徐汝璋等人草擬了一個《廣

西建黨方針草案》，分別寄給南寧和桂林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人，要求他們建立組織，嚴格組織紀律，不能如同過去一盤散沙那樣，要定期開展組織生活，討論《黨綱》草案和《組織章程》草案。討論時事形勢和開展群眾工作。這個《方針草案》得到桂林的人響應。

1948年8月間，托派多數派在上海召開建黨大會。桂林即派出駱椿柏為代表前去參加。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並定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出席這次建黨大會的廣西籍托派份子，除駱椿柏外，還有代表香港組織的蘇燕海，代表廣州組織的姜君羊（廣州選出的代表原為劉平梅，因姜適逢假期要去上海，故改由姜代表廣州組織會的候補中央委員）。在上海的丁肇荃和何伯擎也出席了大會。丁肇荃還被選為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的候補中央委員。

建黨大會過後，駱椿柏回到廣西桂林，立即召集廖淦成、黎華瑞、寧廣居，陸如滿、韋興智、曾佩卿、趙鈞、蘇勝蓮、黃贊明、鄧超蓮、梁良等人在廖淦成家中開會，傳達上海建黨大會的情況。最後一致決定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桂林市支部，推舉駱椿柏為書記，廖淦成為宣傳委員，韋興智為組織委員，鄧超蓮為婦女委員，下設三個小組，成員共16人。廖淦成負責桂北區小組，黃贊明負責桂南區小組，駱椿柏負責廣西大學小組。這樣，廣西第一個托派地方支部便建立起來了。

托派桂林支部建立後，駱椿柏在廣西大學裡與徐太興等人聯絡其他思想上傾向於托派的該校的青年助教和學生組成了一個外圍組織——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參加這個組織的除駱椿柏、寧廣居之外，有徐太興，劉驥、方錦榮、張名鵬、章典、陳淵泉、李剛、周楫寧等人。

1949年8月間，姜君羊由廣州去到桂林，即與駱椿柏、寧廣居等商議，始將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桂林市支部。由姜任書記。寧廣居和徐太興分別負責宣傳和組織

的工作。在桂林解放後，由於黨、團員的變動，黨員大多已經離開桂林，祇好實行黨團組織合併，由姜君羊擔任書記。1950年姜離開桂林後，書記一職由徐太興擔任。

在此之前，中國托派少數派也在1949年間在上海臨解放前召開了建黨大會，成立了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參加這個黨的廣西托派分子有林華援、毛鴻鑑、黃鑑桐、李培貴、李啓成等人。林華援還當選為該黨的中央委員。

此外，1950年，廖真如、曾招任、黃漢傑三人曾在梧州組成了一個托派小組。

（十一）1951-1952年的大逮捕

1949年底，廣西全境解放。在解放的形勢下，廣西的托派組織和個人都面臨一次嚴峻的考驗。事實上因為大部份人已經星散，組織生活已經癱瘓，實際上已經沒有了組織活動；成員的思想也混亂到極點。毫無疑義，共產黨政權是不會容許托派存在的，更何況當時正是一邊倒向蘇聯的時期，斯大林當然不會容忍中國有托派存在。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廣西是托派基地之一。廣西一解放，人們便到處尋找托派的蹤跡，把所有被懷疑為托派的人一一記錄在案；到了全國實行「鎮壓反革命」之時，廣西便率先在訂定省的鎮壓反革命條例時，把托派列為鎮壓的對象，並分別通知被懷疑的人到公安部門去登記聽候處理。面對被鎮壓的局面，不願俯首就擒的人，就祇有想辦法出逃這一條路。但，天地雖大，卻也沒有托派份子容身之地。

1951年，廣西便開始逮捕托派份子，至52年12月全國實行對托派進行大搜捕，在一夜之內便收到了一網打盡之功。據一些統計數字表明，廣西共「逮捕了托派黨員61人，團員16人，托派份子32人，托派外圍份子149人。」（見存檔的廣西黨員史資料：陳新建著《廣西的托派組織及其活動簡況》一文，未刊稿）

顯然，這個數目字是不真實的。實際上，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合共也不超過30人。至於所謂

「托派份子」，「托派外圍份子」，更不知所指為何了。實際上被司法機關判刑的祇有 8 人，即姜君羊、駱椿柏、廖淦成、雷潤清、黃德楷、何春華、李啓成和徐太興。刑期最長的 15 年，最少的 5 年。這些人被送去湖北勞改，刑期屆滿後都得到釋放；祇有姜君羊於刑滿後被強制「留廠就業，繼續改造」，至 1983 年始被遣送回原籍定居。至於由此「托案」被牽連的人，多達 2-3 百人。可算是轟動一時了。這些人全都經過教育後釋放了。

筆者曾有幸結識了一位共產黨人，並且成了朋友。有一次這位朋友曾對筆者說：不是說托派已經成了一具政治殭屍了嗎？真沒想到今日仍冒出了許多托派來？是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把蘇聯的托洛茨基份子確實是砍盡殺絕了，連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斯大林派去的格柏烏特務份子砍死在墨西哥。但奇怪的是老的一代托派份子死了，而新的托派份子又出現了，從三十年代以來，就是這樣綿綿不絕。

歷來的統治者和壓迫者總是千方百計要堵絕被統治受壓迫者的反抗和起義，什麼樣的手段都使盡了。但是被統治被壓迫的人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前赴後繼地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些統治者和壓迫者總是弄不明白，常常哀嘆世風日下。其實，這無他，這祇不過是人類生存必需要有的對正義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有統治有壓迫，就必定有反抗和鬥爭，如此而已。

1999 年 4 月 8 日完稿

（十二）人物誌

本人物誌不可能把廣西所有托派和有托派傾向的人物全部列出。除本文第三節提到的林華援之外，這裡僅將一些主要人物簡誌如下：

（1）毛鴻鑑 廣西荔浦人，1916 年生，桂林師專畢業。「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1936 年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偕同林華援、丁肇荃負責托派《鬥爭》報的出版工作。1938 年回南寧發動傾向托派的青年學生參加第三屆學生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托派分裂為多、少數派，他屬少數派。

1949 年去香港。1956 年，自願回到南寧後任南寧四中教師。「文化大革命」時被秘密關押批鬥，受盡虐待。四人幫垮台後，曾一度回原校復職，不久又再度失蹤，下落不明。

（2）蘇燕海 廣西扶綏長沙鄉人，1917 年生，「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中山大學畢業。40 年代初曾在南寧中學任教，1946 年秋在香港參加托派組織，是托派華南臨委，廣東省委領導人之一。1956 年冬自願回到南寧，任武鳴中學教師。1978 年在武鳴病故。

（3）徐汝璋 南寧人，1917 年生，「叩門讀書會」成員之一。中學畢業後即去當工人。1946 年在香港參加托派，入太古船塢當車工。是托派筲箕灣區委領導人之一。1947 年秋香港機工大罷工時是積極參加者。1956 年冬自願回南寧，入南寧機械廠當車工。1994 年病故。

（4）丁肇荃 廣西武鳴人，1918 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6 年與毛鴻鑑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參與《鬥爭》報的出版工作。1948 年 8 月托派多數派建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委。上海解放後曾一度被捕，釋放後去香港。在港病故。

（5）李培貴 南寧五塘人，1919 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於托派。1939 年曾被國民黨桂林當局逮捕，抗日戰爭結束後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屬少數派。1952 年大逮捕時被判 10 年，後改為無期。1979 年與鄭超麟等人一起恢復公民權。1993 年在上海病逝。

（6）陳傳誼 南寧人，1920 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9 年在桂林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46 年去香港參加托派組織，是托派華南臨委，廣東省委領導人之一，1956 年自願回到廣州，在某工廠任職，中風癱瘓不起。

（7）駱椿柏 廣西田東人，1920 年生，廣西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48 年 8 月曾代表桂林托派組織出席多數派的建黨大會。會後回桂林籌組托派桂林市支部，任支部書記。1951 年被捕，被判 7 年徒刑。刑滿釋放回南寧。「文化

大革命」時，被強迫回鄉勞動改造。1990 年在南寧病故。

(8) 李啓成 廣西桂平人，1919 年生，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37 年曾因廣西王公度案被捕入獄。抗日戰爭後去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屬少數派。1952 年大逮捕時被判刑 5 年。1996 年病故。

(9) 麥俊奇 南寧楊美鎮人，1918 年生，桂林師專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托派組織。曾當過中學教師、校長等職務。1950 年去香港。1956 年秋自願回到南寧後出任中學教師。1983 年在南寧病逝。

(10) 黃德楷 南寧馬村人，1917 年生，曾就讀廣西大學先修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當過中學教師，1946 年曾任南寧商報總編，民鋒報社長，解放前曾任南寧教育局局長，被國民黨逮捕監禁過。1951 年被捕，57 年釋放回南寧。文化大革命時受迫害。九十年代初為南寧文史館館員。1995 年病故。

(11) 黃贊明 南寧人，1916 年生，桂林師專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曾當過國民黨縣長。1948 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員之一，1949 年去香港，後移民加拿大，在加病故。

(12) 雷潤清 南寧人，1918 年生，廣西師範學院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

派組織，1952 年被捕入獄，判 10 年勞改。90 年代初曾任南寧文史館館員，1997 年病故。

(13) 廖淦成 平果人，1918 年生，廣西軍醫學校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1948 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員之一。1952 年被捕，判五年勞改。1995 年在柳州病故。

(14) 李伊人 南寧那龍人，1917 年生，廣西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曾任邕寧縣國中校長，後拒絕與有托派關係或有托派傾向的人來往。解放後曾偷越國境，在深圳被捕，送英德勞改農場改造。在農場病逝。

(15) 何春華 廣西永淳人，1916 年生，浙江大學畢業，中學時即傾向托派，但未參加過托派組織，1945 - 1946 年曾任果德具國中校長。1952 年被捕判 5 年，釋放後回永淳，病故。

(16) 徐太興 江西泰安人，廣西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化學系助教。1947 年參加廣西大學秘密社團「托洛茨基主義研究會」。1949 年與姜君羊、劉驥、陳淵泉、方錦榮、張名鵬等人組成托派桂林市青年團支部。解放後，托派桂林市黨團合併，曾任支部書記。1952 年被捕，判 5 年勞改，釋放後，留廠就業，1998 年在武昌青山病故。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 (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 (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3卷第2/3期 (總第221期)

2006年12月30日出版

出版 / 編輯 / 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powers in China

Zhang Kai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lemented capitalism,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monopoly over foreign trade are going on the wane. The anarch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escapes control and comman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nifests itself as over-he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hence it attempts to slow down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Yet for the local powers, their interests are of priority. There have been resistances from the local authorities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ttemp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o cool down the economy through macro policies. This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CCP's crisis of rul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urba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s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06 increased by 31.3% over the previous period. Yet, the Bureau Chief, Qiu Xiaohua, proudly said in a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June 12 that by the end of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2006-2010), China's economy could overtake Germany, and be as powerful as USA and Japan. He predicted that China could catch up with Japan in 15 years, and with USA in 2049.¹ This reminds one of the catch-up policies of the Big Leap Forward period, when Mao Zedong pledged to catch up with Britain within 7 years and with USA within 15 years.

Recentl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RC, proposed that the priority task for the second half of 2006 was to contro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 macro control and readjustment. However, such emphasis had been repeated many times in the past, but seemed unheeded by the local powers which a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feudal lords", alluding to their relative autonomy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escribed tighter control over credits in March, and fou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bided; their increase of loans for June was RMB 60 billion yuan (USD1=8RMB). But no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gave new loans of 300 billion yuan, quite "out of control". GDP growth for the first six months was 10.9%, and was actually 11.3% for the second quarter, which was a new high in 12 years.²

One reason for the overheated economy is real estates development. Many developers have hoarded large pieces of land. The State Auditing Department's reports show some examples. Between 2003 and 2005, despite the State Council's strict prohibition on cheap sale of land, some local governments ignored the prohibition, causing the state a loss of 5.565 billion yuan of revenue. Of the 87 development zones being audited, 79 offered enterprises a returned tax of 12.015 billion yuan. The unapproved expanded area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lso caused the state a loss of 6.647 billion of tax revenue.

The report also showed that in 2005, some of the compensations due to peasa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21 highway projects were appropria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or removal departments. The sums due to the peasants amounted to 1.639 billion yuan.³

On the other hand, much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go into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2005, USD 11 billion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USA,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were channeled into property and speculation.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was estimated to rise from USD 79.1 billion in 2005 to USD 86.5 billion in 2006.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s decrees to try to contain speculation, the local authorities find various ways to evade the containment. Various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making efforts to regulat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land approval for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easures, the prices of estates have not come down. In Shenzhen Economic Zone, the price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rose by 30%.⁴ In Shanghai, the figures of property trade seemed to have come down, but journalists have found out that for some sales, the buyer, seller and agent agreed to report a lower price.⁵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it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the "feudal lords", the party central moved party secretaries of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different positions before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hen Liangyu,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Party Committee, was removed from his secretary position and his Politburo membership, and even put to investigation of serious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This was a move to send a signal to local authorities resisting the party and state central authorities. One would of course not rule out that this had to do with intra-party power struggle, since Chen Liangyu was part of the clique under the former PRC President Jiang Zemin. Yet, it is doubtful how far such measures could be effective in bringing the local autonomies based on economic interests back to comman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must be abolished and the monopolistic autocracy must be removed before the people can have their intervention and their say in control over resources, and put China onto a different path of development.

30 September 2006

¹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4 June 2006.

²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2 July 2006.

³ *Apple Daily*, 28 June 2006.

⁴ *Wen Hui Pao*, 26 September 2006

⁵ *Apple Daily*, 30 September 2006, reported on such fraudulent cases of property sales in Pudong district, Shanghai.

香港	2	從反對銷售稅到爭取最低工資制.....	本刊評論員
台灣	3	台灣人民的反貪倒扁運動.....	軍行
	4	人民掌權 打倒貪腐 革新政治(轉載).....	工人民主協會
中國	5	平反冤假錯案 立即釋程翔!.....	振言
	6	新聞自由萬歲 秘密審訊可恥 立即釋程翔!(轉載).....	四五行動、社會民主連線
	7	中共中央與地方諸侯的矛盾和抗衡.....	張開
悼念	10	痛悼周翼甌(兆立)同志 (1929-2006).....	十月評論社同人
	11	悼念兆立同志 (1929-2006).....	禾子
	13	痛悼梁時傑同志 (1922-2006).....	十月評論社同人
	14	痛悼姜君羊(蔚然)同志 (1922-2006).....	十月評論社同人
	15	不屈的人——老戰友姜君羊.....	李平
國際	17	安倍政權粉墨登場.....	趙京
	18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號召群眾動員反對八國峰會.....	蔚然譯
	20	關於拉丁美洲局勢的解說.....	蔚然譯
	23	委內瑞拉阿卡薩鋁廠的合作管理.....	蔚然譯
	24	關於委內瑞拉的革命社會主義黨.....	蔚然譯
理論	26	了解帝國主義：過去與現在、舊的和新的統治方式.....	兆立譯
回憶	32	多伊徹著《流亡的先知》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王凡西著 周仁生譯
	38	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	林東
歷史	51	廣西托派史話.....	蔚然
英譯	63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powers in China.....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3 ISSUES 2 & 3 2006.12.30

Hong Kong	2	From opposition to the sales tax to struggle for the minimum wages.....	October Review
Taiwan	3	The people's movemen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he President	Jun Xing
	4	For the people to take power, for transformed politics (reprint)	Workers Democratic Society
China	5	Immediate release of Ching Cheong! (reprint)	April 5 Action, Social Democratic Front
	6	Rehabilitate wronged cases! Immediate release of Ching Cheong	Zhen Yan
	7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powers in China.....	Zhang Kai
Obituaries	10	Deep pain in the loss of Comrade Chow Jih-ou (Zhao Li) (1929-2006).....	October Review
	11	In memory of Comrade Zhao Li (1929-2006)	Wo Zi
	13	Obituary for Comrade Leung Shi Kit (1922-2006)	October Review
	14	Grief over the death of Comrade Jiang Junyang (Wei Ran) (1922-2006).....	October Review
	15	An uncompromising comrade – old militant Jiang Junyang	Li Ping
International	17	The Abe regime comes on to the stage	Zhao Jing
	18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 call for anti-G8 mobilisation in Rostak.....	(tr.) Wei Ran
	20	On the situation in Latin America	(tr.) Wei Ran
	23	Venezuela: Co-management in Alcasa	(tr.) Wei Ran
	24	Venezuela: the Party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	(tr.) Wei Ran
Theory	26	Understanding imperialism: then and now, old and new dominion	(tr.) Zhao Li
Memoirs	32	Isaac Deutscher's <i>The Prophet Outcast</i> and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Wang Fanxi
	38	Youth group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era of war	Lin Dong
History	51	A history of the Trotskyists in Guangxi Province, China	Wei Ran
Article in English	63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powers in China.....	Zhang Kai